

红旗

HONGQI

12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二期 ★

目 录

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 (1)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

来赢得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胜利

——六月三日在阿里阿罕姆社会科学学院的讲话

.....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副主席 约 多 (5)

当前我国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 刘 春 (16)

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 张春汉 施哲敏 (26)

介绍一本揭露美国控制加拿大的书 思 慕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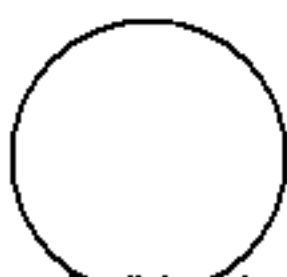
两种姿态,一副肖像 郭 方 (38)

一件小事变成大好事 杨春旭 (40)

原则和规章制度 蔡 金 (43)

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从一个化工厂三种试验田的故事谈起 陆魁宏 (45)



☆ 六月三十日出版 ☆



社論

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

京剧改革是一件大事情。它不仅是一个文化革命，而且是一个社会革命。以这次在北京举行的京剧革命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为开端的京剧改革，以及随着而来的戏剧、曲艺、电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文学艺术各方面的进一步革命化，是我国文化思想领域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观摩演出大会，演出了许多革命的现代戏。这些戏的思想内容一般都是好的，其中有些是很好的，塑造了许多光辉的英雄人物形象，表演艺术也有一些新的创造，发挥了京剧艺术的特长。为了演好革命的现代戏，有些演员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方面，还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有不少人正准备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这一切表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革命的京剧现代戏在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和影响观众方面，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应当为京剧界的成就而向他们祝贺。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①。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社会主义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消灭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影响而斗争。在文艺领域中，戏剧是特别具有群众性的艺术形式之一；京剧是有着广大的爱好者和观众的。因此，同其他各种文艺形式一样，京剧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教育群众，用什么样的感情来影响群众，是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大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比之历史上一切剥削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社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一个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在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里，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历史的总规律是无产阶级终将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并进入共产主义；但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是有起伏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存在的。资本主义复辟可以采取暴力的形式或者“和平演变”的形式，也可以是两种形式互相结合。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不仅使用暴力，而且往往企图用“糖衣炮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59、865页。



彈”的政策，企图通过修正主义，潜移默化地使社会主义逐渐蜕变为资本主义。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又总是千方百计地同无产阶级争夺思想阵地，以便散播反动的政治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毒害和溶化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从思想上为反革命复辟准备条件，开辟道路。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文艺是一个重要的争夺点；作为文艺的重要部门之一的戏剧也不例外。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包括他们的戏剧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大肆散播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等等，竭力反对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贩卖美帝国主义腐朽没落的“新奇”艺术，宣扬美国生活方式，用形形色色颓废下流反动的东西，去毒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使其思想堕落，意志消沉，道德败坏。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是磨灭和腐蚀人民群众革命意志的文艺，是适应帝国主义需要，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效劳，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的文艺。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文艺是什么阶级的思想阵地，宣传什么样的思想，不仅关系到文艺本身是否具有革命性的问题，关系到文艺有没有发展前途的问题，而且更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能不能巩固，能不能发展，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如果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文艺，不是去宣传无产阶级思想，不是热情地表现工农兵的革命精神，表现新时代英雄人物的崇高品质，而是去散播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它不但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文艺，而且由于它所传播的反动腐朽的思想，对人民群众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有着极大的腐蚀作用，而不能不有利于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毫无疑问，这种离开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文艺，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进行。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之一的戏剧，也有必要相适应地把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这就要求京剧艺术，必须根据推陈出新的方针加以改革。什么叫推陈出新？这就是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之陈，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新。不仅要有适合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内容，而且要有适合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形式。表现现代斗争生活的、革命的、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创造的现代戏，在京剧舞台上应当占主要的位置，在其他剧种的舞台上也应当占主要的位置。只有这样，我们的戏剧舞台这个重要的思想阵地，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时代前进了，文艺的内容必须随着改变。不能设想，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统治的舞台，也能够为“兴无灭资”的斗争任务服务。即使在某些传统剧目中，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思想，但是，它们也远不能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远不能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至



于那些包含着封建糟粕的坏戏，则更是有害无益，而必须坚决抛弃。前一个时期，有人提倡在戏曲舞台上大演鬼戏，提倡牛鬼蛇神，还提出所谓“有鬼无害论”，为传播封建迷信的鬼戏做辩护，这是十分有害的，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它大大不利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散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文艺，决不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决不能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而只会对它起阻碍和破坏的作用。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阶级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我们的文学艺术究竟是站在哪一边？是反映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的思想感情呢，还是反映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思想感情？是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士兵服务呢，还是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服务？是执行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呢，还是搞现代修正主义那一套？应当指出，在我国文艺战线上，有的同志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有的同志却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十五年的历史，我国劳动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而有些文艺工作者却对此熟视无睹，缺乏热情，根本不願意或者没有很好地去歌颂、去反映这个斗争。相反地，他们迷恋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还是躲在“象牙之塔”里，死也不肯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他们不断顽强地表现自己，企图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其中极少数人已经开始糜烂，已经蜕化变质。也有些人原来就是站在剥削阶级方面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必须加以改变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革命的群众文化运动已经兴起来了。他们迫切需要革命的戏剧，革命的歌曲，革命的舞蹈，革命的电影，革命的诗歌，革命的小说，革命的美术。在这些方面，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已经开始动手干起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正用革命的文艺去摧毁反动的文艺。面对着这种情况，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有的同志开始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人民群众一起进行文化革命。这样，他们就面目一新，生气勃勃，用文艺武器去反映社会主义的斗争生活，为社会主义服务，因而也得到了群众的欢迎；他们在夺取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方面，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次京剧革命的现代戏观摩演出中，有些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演员，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不能不指出，在整个文艺队伍中，不少人还没有这样做。对于这样一个革命的群众文化运动，有的人采取按兵不动的态度，甚至有的人采取抗拒的态度。因此，我们要大喝一声：必须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用文艺这个武器，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扩展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摧毁资本主义的思想阵地，这是在



我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件头等重要的任务。

文学艺术要革命化，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是文学艺术工作者本身的革命化。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①。这是我们一切文艺工作者走向革命化的根本途径。

革命的文艺家，首先应当是一个革命战士。如果不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不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认真地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感情，对于反映革命的生活就会缺乏热情，对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世界革命人民服务，就会漠不关心，而不能把它当作切身的事业。

毛泽东同志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② 很明显的，只有在工农兵群众的斗争中，经过磨炼，才能在创作上和艺术上获得突飞猛进，才能用文艺武器教育和鼓舞千百万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更加奋勇前进。

在这个文化革命的运动中，京剧开始演革命的现代戏，这是一个极为可喜的现象。有人说，演现代戏就是京剧艺术的枯萎和死亡。事实恰恰相反，由于京剧的开始革命化、群众化，革命的京剧现代戏不仅得到艺术界的赞赏，而且受到各方面群众的欢迎，不仅京剧的老观众喜爱看革命的京剧现代戏，而且过去不常看京剧的人们，也成了革命的京剧现代戏的积极观众。这样，演革命的现代戏，就使京剧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开拓了新的广阔的前途。当然，任何优秀的艺术，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革命的京剧现代戏也是这样。我们不能苛求它一下子臻于完美，也不应当因为有些剧目一时还比较粗糙，或者有些小缺点而轻易放弃。对于那些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革命的思想内容的剧目，我们应当以锲而不舍的毅力，在不断实践中，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进行修改，使它逐渐成熟，逐步改进，逐步提高，日趋完美。至于那些内容好、表演好的优秀剧目，更需要加以推广，并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伟大的任务。各地党的组织和文艺领导部门，必须十分重视这一工作，认真加以领导，推动这个革命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以便在思想意识领域里，有计划、有步骤地彻底打败和消灭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文艺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巨大作用。

^{①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 来赢得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胜利

——六月三日在阿里阿罕姆社会科学学院的讲话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副主席 約 多

随着印度尼西亚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高涨，思想斗争，特别是哲学领域内的斗争也变得尖锐起来。

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民主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而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这次大战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从而引起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巨大兴趣，那么，中国的解放、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的发展，更激起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群众对赢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学说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兴趣。

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当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于在政治上、策略上和组织上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进攻时，就集中力量在思想上对印度尼西亚革命运动，特别是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猛烈进攻，企图在他们之中制造思想混乱和动摇他们的信念。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之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的反动派竭力利用这种分歧，企图损害人民的革命运动而使自己得到好处。

这一切要求我们在哲学方面重新进行自我教育，重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研究二十世纪以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特别是同反动哲学斗争的历史，尤其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修正主义哲学实用主义进行斗争的起源和发展。

如果我们印度尼西亚革命者没有或者没有充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革命的前途就飘摇不定，并且可能是漆黑一团。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善于正确地运用它们来解决我国革命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而特别是我们必须彻底完成的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要求的这项历史使命，即完成第一阶段的民族民主革命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这项历史使命，就将可以并且一定得到实现。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印度尼西亚已经成为合法的公民，它们甚至已成为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目前政治生活中具有最大影响的哲学。二十世纪初，印度尼西亚完全还没有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印度尼西亚出现第一个工人组织的时候，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认识。直到一九一四年，印度尼西亚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成立时，国内才有人开始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时也只限于革命的知識分子。

印度尼西亚古代哲学已经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某些因素。但是，后来由于受到印度哲学和伊斯兰哲学的排挤，这些因素得不到发展，因此，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运动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不是首先通过同印度尼西亚古代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相结合的过程，而是直接同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不断充实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

起初，在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时期，或是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幼年时期，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只限于党的领导人。虽然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六年时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就开始对它的党员群众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这种学习方法是片面的，因为事前还没有学习或者没有充分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論和方法，就直接去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了。

总而言之，当时印度尼西亚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远落后于欧洲。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运动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是因为当时沦为殖民地国家的印度尼西亚，与世界其他部分隔离起来，当时，连书籍都不容易找到。

这种情况基本上持续到日本法西斯垮台才终止。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在印度尼西亚所读到的社会主义理論书籍，由于语言上的原因或者交通上的原因，多半都是荷兰文的，而当时在荷兰本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譯本也有限，因此随同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季米特洛夫等的著作一起，社会民主党书籍和其他的机会主义思潮，也输入印度尼西亚，如巴枯宁、考茨基、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以及荷兰的社会民主党的作家，諸如罗兰、霍尔斯特和亨里特之流的作品。这就是在印度尼西亚出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出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起因，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们說成“批判的烏托邦”和“保守的烏托邦”之类的东西那样。自那时候起，在印度尼西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除了同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斗争外，还得同各种歪曲社会主义的哲学进行斗争。

在很有名望的印度尼西亚要人中间能够找到印度尼西亚机会主义的代表，他们“接受馬



克思主义，但不是彻底的”或者“以修正或调节的方法接受馬克思主义”。他們是陈馬六甲和苏丹·沙里尔，前者是把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同宗教結合，后者是把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各种唯心主义现代主义通婚。

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爆发后，馬克思主义和印度尼西亚人民才获得他們的自由。馬克思主义著作才从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輸入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年輕的馬克思主义者，貪婪地閱讀这些理論著作。《共产党宣言》的譯本就是在革命火焰高升时重新出版的，还有列宁著的《青年团的任务》、斯大林著的《論列宁主义基础》、季米特洛夫的《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毛澤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論》，也是在这个时候譯出的。但是，实际上印度尼西亚的馬克思主义者还未能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情况！

印度尼西亚的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的实际生活中認識到，他們必須克服理論方面的落后状况，当他們学习革命理論时是那么紧密地同当时革命的实际斗争联系起来，这使他們的学习直接地为当时正在高涨的革命的实际斗争服务，这种情况在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罕有的。这对当时的馬克思主义者來說其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是，这也使他們更快地成熟和成长起来。

更重要的是，在八月革命的期間，不但必須捍卫馬克思主义不受外来的攻击，例如，艾地同志曾捍卫过《共产党宣言》不受外来的攻击（日惹《劳工》日报上艾地和苏罗多的辯論），而且，还存在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那些自称为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党、劳工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在把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际政治生活中时发生的矛盾，直到一九四八年，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全国代表會議上通过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的決議后，才糾正了它在政治上、策略上和組織上所犯的錯誤。

在茉莉芬挑衅事件和荷兰殖民者的侵略战争发生之后，馬克思主义者同反动派之間以及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之間的斗争，仍然繼續进行着。然而，由于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了解的結果，馬克思主义者当时在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認識上还犯着教条主义的毛病，这一点反映在当时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綱領上。可以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一九五一年一月重新建党引起了印度尼西亚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次革命。具有正确战略和策略的綱領第一次同正确的組織原則結合起来。印度尼西亚的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解印度尼西亚了！

唤起、动员和組織群众为廢除卖国的圆桌會議协定和反对哈达、納席尔和苏基曼等历届政府而斗争的經驗——成功的經驗——是为概括革命經驗提供最好的准备，由于有了这些經驗，使一九五四年印度尼西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地制定了党綱，这个党綱自从在第六次全国（特別）代表大会上再次通过后，至今基本上仍然适用。这个党綱的确具有它的历史意义。这是第一次正确回答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切重大基本問題的綱領。印度尼西亚馬克思主义者已經了解印度尼西亚了！

这个党綱不仅是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印度尼西亚具体情况的創造性的結合，而且它还教导我們如何在政治斗争中运用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說政策应当



是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的结果。党纲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把它的政策建立在对具体情况和力量对比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上。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努力使党纲通俗化的同时，也就是说在争取使党纲能为群众掌握的同时，更精确地制定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理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同志后来在他为一九五七年七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批准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著作中，精辟地論述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問題。最重要的是，在这本书中，解决了和弄清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一切問題。

当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如何在国内和国际上来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問題越来越重視了。著名的莫斯科宣言也在一九五七年发表了。在这个历史文件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它們的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性。

此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采取了实际的措施来拆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群众隔离开来的墙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深深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群众的思想武器，一旦为群众掌握，就将形成巨大的力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不仅共产党人可以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工人和受压迫的人民也可以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問題是如何找出最正确的方法，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千百万人民所掌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理論工作人員和领导人正在这方面作积极的努力。艾地同志曾在他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总报告中指出，必須更加經常地讲授和介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在学习中把它們同活生生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

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举行的制宪會議上，有很多人在辯論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基础时，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原則性的攻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議會党团成員，在制宪會議中除了保卫建国五项原則和为它而斗争之外，也坚决和有原則地保卫马克思主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党的学习和战斗的口号：“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熟悉情况”。这个口号简单而明了地启发印度尼西亚革命者把理論和实践結合起来。

这是艾地同志在一九五四年提出的論点的重大发展。这一指示希望我們調查研究“社会与經濟情况，以便由此能够确定斗争策略与工作方法”，不然，“对具体事物調查錯誤，将会使他們陷入空想与冒險主义”。

艾地同志的著作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誕生及其发展》（一九五五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历史的經驗教訓》（一九六〇年）、《列宁和印度尼西亚》（一九六〇年）、《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一九六二年）以及其他一系列著作，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印度尼西亚半世紀以来的工人階級运动的經驗，而且由于它們是根据具体的經驗，这为目前工人階級运动的策略提供了更完善的具体論点。

从大大小小的、令人愉快的或令人痛心的經驗中吸取教訓，換句話說，使每一次进步或



后退、成功或失败的經驗教訓，對我們都有好處——印度尼西亞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九五一年以來一直是這樣做的。他們今後將繼續這樣做。

印度尼西亞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甚至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的問題也是有用的，把它看作是一所國際範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大學，儘管有些人對這問題感到痛心和擔心。印度尼西亞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真地研究一切材料，避免主觀主義，積極參加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原則上同現代修正主義和現代教條主義作堅決的鬥爭。

共產主義的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也就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印度尼西亞化的偉大過程”，這個過程日前還在進行中。要是印度尼西亞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採取不謹慎的態度，那麼他們就可能甚至必然要犯大大小小的錯誤。相反，要是印度尼西亞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繼續採取熱誠、認真、謙虛和負責的態度，繼續把理論同實際結合起來，密切聯繫人民群眾並且進行自我批評，那麼勝利必將屬於他們。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有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反對實用主義

鞏固和擴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勝利的首要條件，是堅決反對反動的哲學流派以及工人階級運動中不忠於並且背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流派。它們是改良主義和其他機會主義的基礎。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聲明說，在目前的條件下，思想問題具有特殊的意義，共產黨人認為自己的任務是：在思想戰線上展開堅決的進攻，力求把人民群眾從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思想的精神奴役下，其中包括從改良主義的有害影響下解放出來。

如果人們不懂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什麼，當然就談不上去捍衛它，反過來說，如果人們不懂得實用主義是什麼，也就談不上去擊敗它。當過去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發表有名的“七月八日聲明”，國家人員曾被迫員來沒收載有這項聲明的小冊子，但對這些國家人員並沒有講明小冊子的形狀是什麼樣。我們不應該鬧出這種事來……不論是採取某種行動或者維護某種東西，都應當弄清楚你究竟是對什麼東西採取行動，而你所維護的又究竟是什麼東西。

自從現代修正主義出現以來，特別是自從現代修正主義成為國際工人運動的主要危險以來，在哲學領域中也展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之間的鬥爭。現代修正主義當然一步步地背棄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是因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他們再也沒有用處，甚至對他們是一種危險。在這種情況下，現代修正主義者當然需要用另一種哲學來代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當實用主義伸出援助之手來的時候，現代修正主義者便欣然表示歡迎。現代修正主義就這樣同實用主義結了婚。美國哲學家赫里·威爾斯說，實用主義是“帝國主義的哲學”。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在一九五二年出版的一本選集《帝國



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侵略和战争的鼓吹者》里还集中批判了实用主义。但是，你说怪不怪，历史的发展证明实用主义已经从帝国主义者的主要哲学变成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哲学。实用主义也是辩证地发展的！

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文职官员军事训练班的讲课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作了扼要、全面、正确、通俗和清楚地讲解（有的已印成书，如《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印度尼西亚化》等）。列宁一向指望和鼓励共产党党员，特别是年轻的共产党党员成为“健康的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认为，人们如果不去学习艾地同志写的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就不可能成为健康的和真正的共产党人。在这里，我不想对已谈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更多的解释，我只希望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给以重视，我认为在这里有必要把它们强调一下。

艾地同志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部分，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艾地同志在另一场合里说，“哲学是党的一切策略、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

什么是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在美国是风靡一时，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斯·詹姆斯。实用主义是一个哲学派系，它是以有无成效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凡是有成效的就是合理的，成效就是真理”。

阿伯尔·莱伊在他的《现代哲学》一书中指出，“能说明实用主义特色的是下面的看法：凡是成功的、这样的或那样的适合一定时机的东西，如科学、宗教、道德、传统、习惯、陈规旧套等都是真理”。

艾地同志在举例说明“金钱价值哲学”或者“大商人哲学”的实际行动时指出：“实际上，实用主义只承认主观真理的存在，而不承认客观行动的存在……根据他们的理论，对别人或者对其他国家进行压迫、剥削以及侵略战争，例如荷兰帝国主义者霸占我国领土西伊里安，只要对他们有利，就是真理！”

威廉斯·詹姆斯本人说过，“实用主义就是‘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

列宁一贯教导我们说，现今所有的哲学，和两千年前的哲学一样，都是有倾向性的。只有“从党的原则立场出发来进行观察”，才能认识实用主义的实质。

今天，实用主义的两个显著的特点是：一，他们接受了他们过去拒绝接受的东西，虽然客观条件实质上没有什么变化；二，他们的政策是使一切东西非政治化，使之同政治分离。

由于他们的实用主义观点和立场，现代修正主义者通常总要提出一些免不了闹出笑话的实用主义论点。一九五八年春天我在南斯拉夫的时候，我问那里的修正主义者，物价、电车费为什么上涨。他们回答说：“斯大林是不懂经济的，他的错误在于每年都要降低物价”。我问为什么要解散农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为什么要恢复私人土地所有制，他们回答说，“当我



們仿效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制度时，我們自己的粮食产量总是每况愈下”。当我問他們为什么学西方的样和喜爱抽象艺术和不三不四的舞蹈等等时，他們回答說：“建設社会主义那是白天的事，晚上是归跳舞的……”。

我們可以举出下面的例子說明修正主义者已經接受了他們过去拒絕接受了的东西。

当他們还没有成为修正主义者而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們批評对思想教育的忽视，批評強調純粹是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然而，正是这种“物质刺激”成了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經濟理論的“軸心”。

当他們还没有成为修正主义者而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們在对外政策方面反对通过联合国解决一切問題，因为联合国的表决机器控制在美国手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沒有在这个組織里。但是今天，他們所鼓吹的是通过联合国解决一切問題，从而导致剛果悲剧。

当他們还没有成为修正主义者而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們尖銳地批評了从抽象艺术直到疯狂的舞蹈这些资产阶级文化的表現。但是今天，正是这些甚至于在还没有完全独立和半封建的印度尼西亚全国各地遭到反对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表現却成了現代修正主义者生活中的享受。

我們可以繼續举这种例子，但是这些就已完全足以帮助人們看透修正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实质。

下面是非政治化政策的一些例子，

在經濟方面，現代修正主义者說什么“今天重要的是經濟，而不是政治”，他們甚至以“用于生产的时间更加宝贵”为借口取消工会、青年組織等的政治性會議。如果我們說，“生产和經濟决定于政治”，他們甚至嘲笑我們。

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們更多的強調美，而不是強調政治，认为美可以同政治分开。他們說，艺术家和文学家“首先是艺术家和文学家，然后才是政治家”，他們甚至譏笑我們的“政治是元帅或將軍”的提法。

在战争与和平的問題上，他們說什么，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减少在外层空間的原子放射性尘埃”，他們把原子放射性尘埃同政治分开来，甚至嘲笑我們所說的“帝国主义的原子武器同社会主义的原子武器是不同的”这句话。

現代修正主义者走歪道已經走得那么远，他們不仅拋棄了馬克思学說的革命精神，而且也拋棄了馬克思学說。他們用人道主义来代替阶级观点，用阶级調和和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

按照他們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們一貫采取毫无原則的态度。他們有时向北倒，有时向南倒，这得看好处是在北面还是在南面！由此我們可以很容易識破馬克思主义叛徒的虛伪面目。利用他們自己过去所采取的立場来揭露他們現在采取的立場，是最好的办法，換句話說，就是用他們过去还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所采取的立場，来反对他們已經成为修正主义者以后采取的立場。



关于非政治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是新的。列宁在他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的文章中已赤裸裸地揭露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并重申马克思这个论点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当时明确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随后列宁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所谓“克服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片面性”而提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统一起来”的借口，并且指出这不是辩证法而只是“折衷主义”。由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总是提到“逻辑根据”，因此列宁就指出他们的逻辑只不过是“形式逻辑或经院哲学逻辑的观点，而不是辩证逻辑或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观点”。的确，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的《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衷主义》和《辩证法和折衷主义。“学校”和“机关”》的两章里，列宁具体而又明确地教导我们，如何区别“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如何区别“辩证法”和“折衷主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修正主义者通常也是卖弄学问和非常傲慢的。他们自以为是伟大的理论家，自以为是，瞧不起别人的意见，害怕批评。他们很容易发脾气。其实，他们是从象牙塔里看世界，即工人运动的象牙塔！

他们特别好为人师，但是，又最不喜欢学习，他们喜欢别人了解和尊敬他们，但是从来不肯了解和尊重别人。他们非常喜欢别人对他们报恩，但是从来没想到报答别人。他们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是一个对世界文明毫无贡献的“落后地区”。他们在编写这种或那种哲学、经济学和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总是忽视或者基本上忽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他们狂妄自大，仿佛自己是一个盲人国家里的独眼英雄。他们不懂得，在他们面前的世界人民并不是盲人，而是杰出的人民。他们不懂得列宁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的这句话：“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和列宁在那篇文章中加以斥责的相似。所不同的是，被列宁斥为“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的人是当时欧洲“当权的资产阶级”，而现在，一切落后和垂死事物和中世纪的事物的支持者，除了被列宁斥责的那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外，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教育群众要有自信心，而是教导人民依赖别人。他们不是鼓励人民要勇敢，而是散布恐怖气氛。

在“弱者”面前，他们就像狼在羊面前一样摆威风。但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他们就表现得像一只羊在狼面前一样！

他们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根据对他们是否有用的标准来衡量是非。实用主义一出世，它的弱点就充分暴露出来：事物究竟是因为有用而正确的呢，还是因为正确而有用的呢？

在我们看来，正确的东西未必是那些马上能得到成功的东西。拿国际政局中的某些事情来做例子，老撾、南越、北加里曼丹、马来亚、菲律宾和委内瑞拉人民的斗争是正确的斗争，但这些人民的斗争还没有取得成功。拿古巴革命来做例子，古巴革命是正确的，而且已取得



了胜利。反过来说，荷兰帝国主义者对西伊里安的政策已彻底失败了，而美国帝国主义者也在古巴遭到了彻底失败，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他们是不正义的。然而，帝国主义者在伊拉克、在刚果和在巴西已取得了某些成功，难道这就是说他们是正确的吗？关于实际政治问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同依据实用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拿刚果问题来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谴责阿杜拉，而修正主义者却愉快地同他交谈。

对我们来说，除了同世界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的哲学——实用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以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没有别的其他办法。

三、保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的事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逻辑法的基础。它们是能够正确解释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能够正确阐明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唯一的哲学。

不可知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的敌手，它认为客观世界是无法认识的，“新消极主义”不同意有客观规律的存在和事物彼此是相互制约的，现代主义在哲学方面也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例如“自觉存在论”认为一个人可以不受周围的环境所约束而“单独存在”，又如山塔亚纳的“德美哲学”认为“本体王国”是唯一现实的形式。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是不可认识的，不可知的和不可理解的，因此，绝对真理是存在的，但由于一个人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和出生关系，对每个阶段的认识也就局限于相对真理之上，也就是说，认识[○]和事实之间没有取得完全一致，或者像列宁说的，主观上的相对正确的客观反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实践中获取的。但是有两种知识，一是自然科学，它是从生产实践中获取的，另一是社会科学，它是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获取的。

一种知识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可能是正确的，而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是没有用处的。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又如为恩格斯所赞赏的英国谚语说的：“布丁要吃了以后，才知道好坏”。

的确是这样，两个外国人如果没有吃过榴莲，就对“榴莲的味道好坏”进行争论，那是毫无用处的！

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重视实践和事实，那末，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时说：“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和研究所知的一切事实”。

前些时候，艾地同志说：“一个不重视调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一个严肃认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从一九五一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始把自己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自从那时以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得到迅速的发展，秘



訣就在这里。艾地同志本人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他首先在西爪哇，然后在东爪哇和中爪哇对农民情况和农民运动进行了调查。首次的调查结果已经发表了，第二和第三次的调查结果将陆续发表。

号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所有干部，包括从事理论、艺术、文学、记者等干部下放，是为了让他们从亲身的体会来了解情况，因为一个革命者如果不了解情况就不可能使自己同被压迫人民打成一片，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亲身的体会就不可能对情况了解透彻。人们也可以从书本上或听人说来间接了解情况，因为我们所要了解的情况如此之多，因此我们不可能每了解一件事都得亲身去体会，但是一切经过亲身的实践而了解的东西，总比间接了解的东西可靠。

例如一个城市里的人在几天内亲眼看到贫农和雇农每天只吃一餐而且吃的又不是米饭的情景，就会对这种遭遇表示“同情”，甚至可能由于感动而掉眼泪。但是这位城市里的人，如果没有体会到连续一个星期每天只吃一餐而且吃的又不是米饭的时候，他的体会和感受是不会深刻的。

总而言之，一个人如果不投入战斗中，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战士，如果不投入革命斗争中，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在党的政治工作中运用唯物主义的原理，并且用科学的方法制订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只有一个党把自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行集体领导，敢于承认错误，哪怕是严重的错误，并敢于纠正错误，经常向群众学习和汲取外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才能作到这一点。

艾地同志说过：“现在党已经具有明确的战略和基本策略，因此不容易再上左倾思想或投降思想的当了，也不容易再受煽动，更不容易因获胜而得意忘形。但是只懂得战略和基本策略还是不够的。我们的党要始终详细或较详细地了解正在发展的形势，确定以便对这种形势来确定我们的立场，采取步骤和采取有利于人民的行动，并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中央委员会所决定的，要加强对群众的情况和生活进行调查研究是完全正确的……”。

在制订党的策略的时候，应该永远遵守“主观必须符合客观”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正如艾地同志所说的，在某个时期“正在发展中的形势”或力量对比是“客观”存在的，而我们的思想是“主观”的东西。如果我们所制订的策略不符合“正在发展中的形势”和不是采取进步的方式来改变这种形势，那么这策略是主观的。只有依据“正在发展中的形势”和采取进步的方式改变形势的策略才是客观的。也就是说，要通过正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所阐明的那样“对具体情况和力量对比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改变形势。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除了制定每个时期的正确的策略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着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群众所掌握的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对他们进行扼要明确的讲解。例如艾地同志所提出的公式“多、多、来、米、法”^{*}，它的重要意义我们是很难全面估计的。它使群众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解决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作用，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自己崇拜的东



西。一个把馬克思列宁主义自封起来和不考虑如何把它献给人民的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

馬克思主义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已經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已經成为改造印度尼西亚的斗争中的主要趋向。在印度尼西亚，没有一个政治家不知道馬克思主义或不受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至于，印度尼西亚的反革命分子，在发现要当公开的反动派分子十分困难之后，便設法穿上假革命的外衣，并同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又害怕这样做的深远后果的中间路綫分子一起宣称他們自己是“馬克思主义者”。“辯证法”这个名詞今天已經在印度尼西亚成了模特儿。有的人这样理解其含义，正如当时苏加諾总统提出总统方案时所說的“真理就是从不同意見的摩擦中产生的”，也有的人不知道“头尾”跟着人家說“辯证唯物主义，辯证唯物主义”。

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而且一定会对彻底实现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理想作出贡献，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不能算小的贡献。为此，我們应当繼續改进我們对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和运用，我們可以利用印度尼西亚文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澤东和艾地的著作。有些以“馬克思主义者”为名而修正主义者是实自封的“馬克思主义者”批評这些著作，說什么这些著作中至少有一部分“过于简单”。瞧！我說修正主义者同純是說大話和晦澀难懂的东西是一样的，可不是說得对嗎？加諾兄非常推崇的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去年冬季曾对我說：在她看来，当代世界上有三个革命領袖“用的語言是人民的語言”，他們是毛澤东、卡斯特罗和艾地。当然，也包括胡志明、金日成和野坂参三等同志在內。这些批評家批評他們的著作“过于简单”，但这些人又写了什么更高明的著作沒有？确也有人写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但人們讀了这些书后，确实无法弄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而斯大林著的《論列宁主义基础》讲得那么明确，問題的中心也說得很清楚，語言也通俗易懂，讀了就会永远記在我們心上。当然，人們应当进一步学习其他的著作，学习如何創造性地运用它們。如果想懂得农民、无产阶级专政、党、理論和方法这些根本問題，学习斯大林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在哲学方面，除了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諾夫和列宁的經典著作外，还有斯大林著的《辯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毛澤东同志的《实践論》、《矛盾論》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上面已經提到的艾地同志关于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闡述，已經收集在他的著作《論馬克思主义》和《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印度尼西亚化》中。如果我們想成为像高尔基所說的是“真正的革命家”而不是“业余的革命家”，我們就应当学习所有这些著作，而且要一讀再讀。

讓我們以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来贏得我們革命的胜利！

【譯自一九六四年六月九日、十日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

* 本刊編者注：“多、多、来、米、法”即“11234”。这条公式的意义是，在革命中有一个先锋队，即工人阶级；一个主要力量，即农民；两个民族陣綫的基础，即工人和农民；三个革命的动力，即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就是说，所有的劳动人民；四个民族陣綫的力量，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見印尼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关于艾地的政治报告的決議）。



当前我国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

刘 春

民族问题是和阶级问题相联系的，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①这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我们在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不论是对待国际范围内的民族殖民地问题，还是对待我国国内的民族问题，不论是对待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还是对待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族问题，都必须紧紧地记住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

民族是一个一定时代的历史范畴，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马克思说过：“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②。一个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压迫、剥削本民族劳动人民的同时，总是在国内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在国外争夺市场、原料出产地与投资场所，扩大自己的剥削范围；力图建立民族压迫制度和殖民制度，实行残暴的民族侵略和民族压迫，把其他民族置于自己的剥削之下。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资本主义制度

存在，只要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就不会消除。

民族压迫，决不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剥削阶级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民族所有的人同另外一个民族所有的人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压迫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去压迫被压迫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人，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压迫者是极少数，被压迫者是绝大多数。毛泽东同志说：“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③

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侵略和压迫别的民族的时候，总是打着民族的旗号，宣称他们是为了本民族全民的利益。这是可耻的欺骗伎俩。他们侵略和压迫别的民族，不

①②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见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③ 《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9页。



仅绝对不符合本民族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恰恰是完全违背本民族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从根本上反对他们的。恩格斯早就指出过：“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① 马克思在给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中指出，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的敌视态度，“使自己变成了本国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② 列宁说：“对‘异族人’的压迫，是一根有两头的棍子。这根棍子一头打击‘异族人’，另一头打击俄罗斯民族。”^③ 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和各民族劳动人民，必须识破资产阶级的和其他剥削阶级的这种欺骗手法，反对任何民族侵略和民族压迫，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

马克思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打击，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所必需的。马克思在给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中写道，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英国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④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列宁认为必须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列宁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⑤ 毛泽东同志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

运动相互关系的原理，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作出了极其崇高的估价。在去年八月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声明中，毛泽东同志有力地指出：“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⑥ 毛泽东同志说，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他们做尽了坏事，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他说，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⑦

在被压迫民族中，真正遭受民族压迫的主要的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中最大多数是农民。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在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侵犯到自己阶级利益的时候，往往能够同本民族

- ① 《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10页。
- ②④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4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55、256页。
- ③ 《民族平等》。《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3页。
- ⑤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8页。
- ⑥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见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 ⑦ 1960年5月9日接见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外宾时的谈话。见1960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的广大劳动人民一道，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应该联合他们。但是，同时又要看到，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所采取的态度，归根到底是以他们的阶级利益为转移的。至于被压迫民族中的同帝国主义有勾结的反动派，不仅不会反抗民族压迫，而且还会同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联合起来，作他们的走狗，共同压迫和剥削本民族的劳动人民。

由此可见，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实质就是反对压迫民族的压迫阶级的斗争，并且往往同时就是反对本民族的反动派和卖国贼的斗争。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不把民族问题看作是一个孤立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解决民族问题是一个革命的问题，是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上，无产阶级政党在民族问题上具有不同的任务。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总问题的一部分。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要想取得民族的平等和彻底解放，就必须坚决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及其走狗的统治，并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①

二

我国国内的民族问题，是我国革命总问题

的一部分，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是我国革命总任务的一部分。国内民族问题这一个局部问题的处理，必须服从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只有在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我国国内的民族问题才有可能获得解决。

解放以前，我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国内各民族同样都遭受外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在国内，各少数民族又遭受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一九四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② 外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实质上是外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国内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实质上是汉族中的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汉族中的广大劳动人民，也同样遭受汉族中的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同时，少数民族内部又分别存在着封建阶级、奴隶主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和汉族中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压迫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这就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的内容和它的阶级实质所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三大敌人。在这三大敌人中，帝国主义又是我国各民族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中华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88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4页。



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①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严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要求我国各民族必须实行最紧密的统一和团结。历史已经证明，我国各少数民族必须同汉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三大敌人，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压迫，才能取得民族的平等和解放。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从我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内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根本方针，这就是：实行民族平等，领导和团结各民族共同进行反对三大敌人的革命斗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统一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在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祖国大家庭内，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围绕这个方针，党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领导各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团结一致，进行了多年的英勇的革命斗争。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以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被推翻了，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从而胜利地完成了中华民族对外争取独立解放、实现祖国统一的任务；同时也彻底废除了国内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各民族的平等和区域自治。

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各少数民族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已经在我国取得了伟大成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一部分，它不仅保障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保障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团结了自治地方的各民族劳动人民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且是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用以进行民主改革，保卫民主革命胜利成果，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是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用以进行敌我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武器。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并没有随之完全解决。这是因为，在许多少数民族中，还存在着封建阶级以至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他们为了继续保持住剥削统治的地位，总是在千方百计地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挑拨民族关系，甚至发动叛乱，分裂祖国的统一，破坏我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事业，以达到维护和发展他们一小撮人的阶级私利的罪恶目的。在他们的统治压迫下，少数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还遭受着残酷的剥削，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来说，国家所赋予的民族平等权利，他们是无法充分享受甚至是享受不到的。各民族落后的生产力更得不到改变和发展。他们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没有得到阶级解放。而没有少数民族中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解放，也就不可能有彻底的民族解放。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5—626页。



在解决我国国内民族问题方面，有两个根本的认识问题必须澄清。

第一，任何民族内部都是有阶级的。那么，什么人，确切地说，什么阶级是民族的主体呢？民族的利益应当是什么人的利益呢？民族的解放应当是什么人的解放呢？民族的平等和发展又应当是什么人的平等和发展呢？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是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和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民族观的一道分水岭。

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总是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放在全民族人民的利益之上。他们企图垄断“民族”的名义，宣布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和民族利益的保护者。在他们看来，民族的主体就是他们剥削阶级。他们的阶级利益，就是民族利益。对他们来说，只要是他们的阶级私利得到满足，“民族平等”、“民族解放”就实现了，“民族问题”就解决了。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看法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民族的主体，只能是在这个民族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对我国少数民族来说，民族的主体就是农民（牧民）、农奴和奴隶，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贫苦的、受压迫最深的农（牧）民、农奴和奴隶。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① 民族的利益，归根到底是这些最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利益。民族的解放，必须是民族中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解放。民族

的平等和发展，也只能理解为民族中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平等和发展。民族问题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各民族中这些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问题。没有各民族中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平等和解放，就没有整个民族的平等和解放，也就谈不到民族问题的解决。

第二，民族问题依靠什么人来解决？少数民族中的剥削阶级认为，只要依靠剥削阶级中的少数上层分子，由他们采取一些改良措施，经过一些改良，或者投靠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仰仗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恩赐，“民族平等”、“民族解放”就可以实现了，“民族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他们根本反对群众和反对革命，当然不可能选择依靠群众实行革命的道路。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要解决民族问题，必须经过被压迫民族的被剥削阶级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领导和发动各少数民族中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革命斗争，并且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一切改良主义和恩赐观点都是根本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是无产阶级民族观同资产阶级民族观的又一道分水岭。

革命的问题，对于任何民族来说，都是最根本的问题，离开革命和阶级斗争，决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少数民族人民进行革命，就是为了解决民族问题，革命进行得越彻底，民族问题也就解决得越彻底。那种认为不经过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53页。



斗争，不进行内部的革命，就可以解决民族问题的观点，实际上是不要解决民族问题，反对解决民族问题。这种观点，不过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一种表现。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在解放以后，国内的民族问题，无论就各民族间的关系来说，还是就少数民族自身来说，其根源还是在某些少数民族内部存在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因此，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只有在少数民族内部充分发动劳动人民进行革命。不仅要进行和完成民主革命，而且要进行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总之，要发动劳动人民有步骤地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压迫制度，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消灭产生剥削的私有制度。

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方针和政策，首先进行了民主改革，用自己的双手推翻了封建主和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接着绝大多数的兄弟民族地区又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农（牧）民积极参加人民公社，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同时，各少数民族地区，又同全国各地一样，大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就使我国各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近几年来，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引导下，又克服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种种困难，经济情况得到全面的好转。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从城市到乡村，从农村到牧区，从内地到边疆，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社会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人口也在逐年增加。我国各

少数民族的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一年比一年更加团结，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我们祖国的统一，一年比一年更加巩固了。

在整个过渡时期，我们党在国内民族问题方面必须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巩固祖国统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加强工农联盟，加强民族团结，保障民族平等和实行区域自治，领导各少数民族完成民主革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成为现代的民族，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使各民族共同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还仅仅处在开始阶段。为了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把民主革命（包括宗教中的封建制度的改革）进行彻底，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党必须团结各少数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组织和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坚决依靠这支阶级队伍来进行各项工作；要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培养和壮大无产阶级（包括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办好人民公社和生产合作社，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对少数民族中的干部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以及国际主义的教育，要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他们革命



化；要加强中央和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加强祖国各民族人民之间在共同劳动、共同斗争、共同生活中的平等团结和友爱互助，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实行同少数民族中的爱国的上层分子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决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的少数民族中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作斗争。

我们党向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进行工作，把他们吸引到反帝爱国的统一战线中来，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主要敌人，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也是为了通过统一战线来团结、教育和改造他们，按照六条政治标准，在党的领导下，反帝、爱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看到，我们党同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建立的统一战线，是为工农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必须使这方面的工作，更有利于少数民族中的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

三

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完成了民主改革，并且在绝大部分地区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以后，我国还有没有民族问题呢？民族问题的实质是不是还是阶级问题呢？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对任

何民族都没有例外。各少数民族中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又必然要反映到民族问题上来，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蒋介石匪帮以及各民族中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处心积虑地在我国各民族之间挑起民族矛盾，妄图破坏我们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使封建制度甚至奴隶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复辟；各少数民族中被推翻的反动剥削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千方百计地挑拨民族关系，进行各种破坏，图谋复辟；少数民族中没有改造好的民族宗教上层分子，站在原来的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企图挑起民族矛盾，来保护或者恢复他们的阶级利益；有些少数民族中还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是产生民族主义的根源；各民族农民中都有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他们最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在少数民族中，在国内民族关系方面，所以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究其根源，都不外上面这些原因。很清楚，当前我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实质上仍然是阶级问题，其根源依然是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

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同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民族观是根本不相容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一种必须克服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但是，近几年来，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很猖狂，他们同帝国主义者、外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及国内反革命分子勾结起来，千方百计地



挑起民族間的矛盾，妄想达到他們分裂祖国的統一、恢复剝削压迫制度的目的。他們进攻的矛头指向的是祖国的統一、民族团结、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他們的口号是“反汉，独立，永不改革”。因此，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同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解放以来实际生活表明，一切打着民族旗号进行反对祖国、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活动的，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敌人。

一切民族中的反动派，都常常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维护者，实际上他們是民族利益的背叛者，他們所关心的不是占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极少数剝削階級的私利。为此，他們就不惜出卖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祖国，投靠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他們用维护民族利益的幌子来欺騙本民族的劳动人民，实际上准备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最凶恶的迫害、最殘酷的剝削。解放以前，我国許多少数民族，在这些反动派的黑暗統治下，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民遭受各种压迫和剝削，生活极端貧困，人口不断减少，民族本身已处于衰退和灭亡的境地。在临解放前时，藏族劳动人民的处境，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現在，少数民族中的反动派所讲的“维护民族利益”，就是这种使少数民族走向貧困、衰退甚至灭亡的“利益”。各民族人民必須坚决粉碎这些反动派的破坏活动。

民族主义本来是资产階級的思想，現在被推翻了的封建主、农奴主和奴隶主階級，也利用它来作为同我們进行斗争的工具。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者，过

去、現在和将来都是害怕和仇視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統一的，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一天不会停止对我国各民族的統一团结进行挑撥和破坏，而一小撮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恰恰是在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策划和直接指揮下进行的，或者正是适应了他們的需要而进行的，作了他們进行顛复破坏活动的內应。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这种反动性。

在我国某些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出現了一个新的突出的情况，就是現代修正主义者在那里瘋狂地挑撥我国的民族关系，大規模地进行顛复活动，煽惑和胁迫大批的边境少数民族居民外逃。現代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罪恶活动，引起了我国各民族人民无比的憤怒。我国各民族人民坚决反对并且决心彻底粉碎他們这种罪恶活动。

四

在全国解放以后，我国各民族实现了空前的統一和团结，但是，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間的隔閡，并没有完全消除。同时，我国各民族之間在經济发展上和文化发展上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各民族还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等等。

我們在处理民族問題的时候，應該經常注意这些因素，分析这些因素，把它們作为民族問題的重要任务来加以解决。

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間的隔閡可能产生的影响，我們党历来是予以足够的重



視的。但是，我們党从来也不把民族間的隔閡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我們党认为，产生民族間的隔閡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在于帝国主义所实行的分裂被压迫国家的統一和民族团結的政策，在于压迫民族的剝削階級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也还在于被压迫民族的統治階級不断地对本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挑撥和欺騙。随着民族压迫的消灭，少数民族同汉族的隔閡，經過我們党的努力工作，必然会逐渐消失。因为在我們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少数民族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的貧农、下中农，是有很高的革命热情的。他們是一切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的对头，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經濟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他們积极拥护实行民族平等、維護祖國的統一和民族的团結。他們的利益和汉族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种階級利益的一致，是最巩固的团結基础。事实也正是这样。十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劳动人民相互关怀，广大的汉族人民，从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对各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了兄弟般的帮助，各少数民族人民也同样帮助了汉族人民。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間，經過长时期的共同的革命斗争，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一种完全新型的平等团結、友爱互助的兄弟般的民族关系，正在形成和发展。这就证明，在摆脱了剝削階級的剝削和压迫之后，有着共同的階級利益的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間，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閡，是没有长期存在的根据的。

当然，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閡的残余，目前在某些人中間还有一定影响。而

且，由于帝国主义者、現代修正主义者、国内外反动派以及少数民族中的剝削階級，正在利用这种影响进行挑撥离間，这个问题就更加应该引起我們的注意。列宁說：“怎样消除这种不信任呢？怎样克服这种不信任而造成相互的信任呢？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同心协力地反对各国的地主資本家，反对他們的复辟企图，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維埃政权。”^①因此，要彻底消除这种影响，加强民族間的亲密团結，只有在各少数民族中加强階級教育，繼續进行階級斗争，开展对敌斗争，彻底粉碎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我国各民族間在經濟发展和文化发展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民族問題的一个重要內容。党和国家必須领导和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发展社会主义的經濟和文化，使我国各少数民族都达到先进民族的水平。十几年来，党和国家对这个問題給予了最大的关切，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因此，在短短的十多年中間，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經濟面貌已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农、牧业生产比解放前有了成倍、成几倍的增长；到处都修通了公路；不少地区兴建了铁路；各地普遍办起了学校和医院；各少数民族的人口都有了增加；大批的少数民族革命干部和知識分子正在成长壮大。少数民族地区同汉族地区在經濟、文化发展上的距离，已經大大縮小。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各民族之間在經

^① 《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63頁。



济上和文化发展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内部长期的阶级剥削、压迫所造成的，并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完全消除的。在消灭了民族压迫以后，必须进一步领导少数民族中的劳动人民消灭封建制度乃至奴隶制度，消灭私有制，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才能最后消除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同时，也只有这样，少数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才有可能充分利用先进民族的帮助，使这种帮助真正有利于自己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以后，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必然会逐渐消除。这就是说，消灭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决不单纯是一个发展经济和文化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它仍然是一个革命的问题。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有不同的历史情况和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这些特点，同时也构成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正在日益加强，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共同劳动、共同斗争、共同生活中，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觉悟正在不断地提高，在祖国各民族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础上，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必然会越来越多，而民族间的差别性必然会逐渐减少。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一种进步的现象。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时期内，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还将存在，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消灭了阶级以后，随着民族的逐渐消亡和

民族融合的实现，民族的特点和差别性才会消亡。

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照顾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因为这样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少数民族中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促进少数民族的繁荣和发展。民族之间的特点和差别性，可能在各民族之间引起某些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在工作中去解决，或者经过必要的教育去解决。这些问题，都不是民族矛盾。所谓民族矛盾，是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反映。把民族特点、民族差别同民族矛盾混淆起来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如果夸大民族特点，制造民族差别，搞什么“民族特殊”，也是根本错误的。

总之，在社会主义时期，无论是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是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性，都不是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本的原因。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各民族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社会主义时期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本的原因，其所以会出现种种不适当的和错误的观点，主要是由于不懂得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不懂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因而在观察民族问题的时候，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认真研究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联系，认清清楚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



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

張春汉

施哲敏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接見非洲朋友时指出：“种族問題实质上是阶级問題。”^①这一科学論断，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种族問題的基本观点。只有根据这个观点，才能找到产生种族歧視的社会根源，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进行种族歧視和种族迫害的罪恶目的；也只有根据这个观点，才能对如何彻底消除种族歧視这个重要的問題得出正确的結論。

人类分为各种不同的种族，这是一种自然現象。各个人种在皮肤的顏色、头发、眼睛的形状和嘴唇的厚薄上具有不同的特征，这是人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这些特征带有适应自然条件的性质。人类在种族上的这种差別，同人的智力、心理和思維方式毫无关系。种族根本没有优劣之分。

种族不同于民族。民族是随着資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社会現象。斯大林說：“民族是人們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②一个民族可以由不同的种族組成。一个种族也可

以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有的种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还可能单独形成一个民族。現在美国的黑人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

种族的差別本来是自然現象，属于人种学的问题，为什么会发展为种族歧視，从而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問題呢？对这个問題，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

种族歧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早在奴隶社会，就产生了人类种族生来不平等的观念。当时奴隶主阶级为了替自己无偿占有奴隶的地位辯护，便杜撰出所謂“人种优劣論”，說什么既然树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品种，那为什么我們不能把人区分为主人和奴隶呢？这种人类种族不平等的思想，在奴隶制的古羅馬得到了广泛的傳播。因为古羅馬的奴隶，主要是从被征服的異族中擄获的，奴隶主总是把異族人看成是劣等种族。到了封建社会，封建主阶级为了替封建等級制度辯护，也竭力宣揚这种“人种优劣論”，喋喋不休地炫耀自己的血統和家世，夸耀自己的肉体来源于“优等”血統。

资产阶级取得統治以后，发现种族主义

① 見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第1版。

② 《馬克思主义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4頁。



理論不仅可以为它在國內进行階級压迫和階級剝削服务，而且还可以为它对外实行掠夺和征服殖民地服务，因而資產階級学者竭力加以宣揚，使种族主义理論得到更广泛的流傳。如果說，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种族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一个国家內的剝削階級对被剝削階級的压迫和歧視，那么，在資本主义社会，这种歧視和压迫已由國內发展到国外，階級关系就常常被种族的外衣所掩盖。这时候，种族歧視就和民族殖民地問題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为了适应殖民主义者征服弱小民族的需要，欧洲資產階級的种族主义“理論家”硬說，人类各个种族和民族彼此在生理上和精神特性上有差別，說什么有的种族或民族生来就有“高度的智慧和天賦”，是“优等”种族，自然賦予它以主宰世界的使命；有的种族或民族生来就存在着“生理缺陷”，是“劣等”种族，命定地應該接受“优等”种族的統治。有个殖民主义的辯護士胡安·希內斯·德·塞普耳韦达在一五五〇年写道：印第安人不是有理智的人，他們“不同于西班牙人，正如猿猴不同于人或兽性不同于人情一样”。一七八六年，在英国一个哲学学会上宣讀的一篇論文中，断言黑人“比其他任何人种更接近于动物。”

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对于夸耀自己肉体来源的封建貴族曾經作过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出生只是賦予人以个人的存在，首先只是賦予他以生命，使他成为自然的个人；而国家的規定，如立法权等等，则是社会产物，是社会的产儿，而不是自然的个人的产物，正因为这样，所以个人的出生和作为特定的社会地位、特定的社会

职能等等的个体化的个人之間存在着直接的一一，直接的吻合，就是一件怪事，一个奇迹。在这种体系中，自然界就像生出眼睛和鼻子一样直接生出王公貴族等等。令人奇怪的是，这种体系居然把具有自我意識的类的产物拿来冒充自然类的直接产物。……人的形体素质或人体的素质（說得更清楚些就是：肉体的自然的国家成員的素质）竟使特定的即最高的社会地位成为由出生所注定的特定肉体的地位。怪不得貴族要这样夸耀自己的血統自己的家世，一句話，夸耀自己肉体的来源。这当然是紋章学所研究的动物的世界观。貴族的秘密就是动物学。”^①一切反动統治階級的种族主义理論，都是建筑在这种“动物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

欧洲資產階級就是在“种族优劣論”的掩飾下开始了他們的掠夺史。

自从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西方資產階級就为这块肥沃的土地垂涎欲滴。首先踏上美洲大陆的是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他們为了要使自己成为美洲的主人，儼然以“优等”种族自居，誣蔑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劣等”种族，并对印第安人和其他土著居民进行大規模的杀戮，使当地居民由原来的一千八百万人銳减至一百万人。历时不久，西方其他殖民主义者也接踵而至，特别是来自不列顛群島的盎格魯撒克逊族侵入以后，更积极地参与了对印第安人的杀害。

由于欧洲殖民主义者惨无人道的人身摧殘，美洲的土著居民显著地减少了，使当时在美洲积极发展种植园和开发矿場的西方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77頁。



国的殖民主义者极度感到劳动力缺乏，于是便开始了历史上最可耻的贩卖黑人的“三角贸易”。

殖民主义者从贩卖黑人的罪恶活动中获取了惊人的利润，成为西欧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时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役化，被埋于矿坑，正在开始的东印度的征服与劫掠，非洲被转化为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都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要素。”^①

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在帝国主义国家和由它们控制的殖民地，这种野蛮的种族歧视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以标榜“文明”、“自由和民主”的美国来说，黑人在社会生活方面受到种种难以忍受的歧视。美国其他少数有色人种的处境也同样十分悲惨。印第安人布拉斯韦尔说：“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受着歧视。我们被白人、土地掠夺者和投机者认为是野蛮人，被认为不比野兽好一点。”“许多整个印第安村庄被消灭，男人、妇女和儿童被任意枪杀，然后他们的尸体被垒起来烧掉。之后，那些作了这些事情的人被授予奖章。”^②美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实行着野蛮的种族歧视政策。

二

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罪恶的种族歧视政策，并不是这个国家的某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和歧视，而是那个民族中的一小撮剥削者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和歧视；至于那个民族中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则是

一切被压迫、被歧视民族中的劳动人民的阶级兄弟，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共同的，一致的。所以，种族歧视实际上是一种阶级歧视和压迫，是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一种阶级政策。

我们只要对被歧视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一番阶级分析，就可以透过一层薄薄的种族外衣看到种族歧视的阶级实质。

以美国黑人的情况为例，今天占美国总人口百分之十一的两千万黑人是美国垄断资本进行残酷压榨的对象。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属于收入低微的贫困阶层。随着美国垄断资本的日益集中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黑人的景况还在继续恶化。美国黑人原来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南部各州的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现在则愈来愈多的离乡背井，纷纷进入劳动力市场，由农业劳动者变为无产者。据统计，原住在美国南部农村的黑人已由本世纪初的百分之七十五降至现在的百分之二十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头三次经济危机中，黑人失业比例分别增加了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一百一十六点七和百分之三百二十六。目前美国黑人的失业比例高达百分之十五点三。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以种族矛盾去掩盖阶级矛盾，离间白人和黑人中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团结，支付给白人工人的工资高于黑人；但从这种种族歧视的工资政策中得到好处的只是白人中的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据美国经济学家佩济在五十年代初期统计，仅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48—949页。

^② 见1963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第3版。



仅由于黑人平均工资和白人平均工资之间的差额，美国垄断集团每年就可以从雇用的黑人那里（不包括女佣）获取超额利润四十亿美元。现在则已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仅一九六二年，美国公司和雇主从黑人身上榨取的超额利润竟达一百四十亿美元。

在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实质上是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歧视，而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正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说得对：“使美国黑人成为残酷剥削、狠毒压迫和暴行的专门目标的，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①

不仅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就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种族问题，同样实质上是阶级问题。帝国主义在向外扩张的时候，常常打着“全民族”的旗号，实际上，向外发动侵略和战争的只是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从殖民地掠夺大量财富的也是他们。在殖民地遭受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和种族迫害的，主要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的劳动人民；殖民地的买办阶级同殖民主义者虽属于不同的种族或民族，但阶级利益的一致，促使他们相互勾结，压迫殖民地的劳动人民。帝国主义者需要殖民地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充当他们的走狗和代理人；殖民地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也需要帝国主义作为靠山。

种族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压迫，在非洲表现得更为明显。自从帝国主义者瓜分了非洲以后，白人殖民主义者就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民头上称王称霸。而当地的绝大多数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都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在农业中，由于殖民主义者的入侵，非

洲人的大量土地被掠夺，他们不得不去殖民主义者的农场充当雇工。在工业中也设置了种种肤色限制，非洲工人不得担任专门技能的工作，只能干一些最繁重、工资最低的粗活。采矿业中井下作业是最危险和最繁重的工作，而在南非，井下作业的工人总数中，非洲人占了三分之二。在肯尼亚，非洲工人的工资只及白人五十分之一至十五分之一。殖民主义者付给白人工人较高的工资，并不是白人工人与白人统治者有着什么共同的利益，殖民主义者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以种族的壁垒去阻挠被压迫阶级的联合。

种族歧视政策，是一切侵略者和帝国主义所采用的。

在历史上，一切侵略者向外实行扩张的时候，总是自称为“优等种族”，而把被侵略者说成是“劣等人种”，认为“劣等人种”应当受“优等种族”的统治和奴役。“古罗马帝国把德国人和法国人鄙视为‘劣等种族’，‘野蛮人’，认为他们应该永远服从‘优等种族’，服从‘大罗马帝国’”^②。到了现代，帝国主义者为了向外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总是大力宣扬反动的种族主义。一九〇〇年，英、法、德、俄、日等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就宣扬“文明的欧洲人”向“野蛮的中国人”播种“文明”，消灭“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德国法西斯强盗希特勒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就竭力宣扬德国日尔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

① 罗伯特·威廉：《毛泽东的美国黑人解放宣言》。见1963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第4版。
②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62页。



他們理所当然地应当統治其他“劣等”民族，統治全世界。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也宣揚盎格魯撒克逊人是具有“最高文明”的人种，优越于其他一切种族；他們无耻地說什么全人类的命运将由盎格魯撒克逊人来安排。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必然要引起被侵略国家人民的不断反抗和斗争。这时候，帝国主义者就往往誣蔑被侵略国家的人民是“种族主义”者。例如，一九〇〇年，由于帝国主义豺狼們入侵中国，中国人民自发地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帝国主义者硬說：“这是由黄种人敌視白种人”，“中国人仇視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帝国主义强盜們把这次中国人民的偉大的反对侵略的战争，說成是“黄种人反对白种人”的战争。

对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叫囂和謬論，列宁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他說：“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們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們之間并无冲突，他們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来进行欺騙、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販卖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一八五六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們嗎？”^①

帝国主义者所以把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的反抗說成是“种族主义”的行为，就是为了在本国人民中煽动种族仇恨，轉移人民的革命視綫，掩盖阶级矛盾和斗争，以便动員国内劳动人民为侵略战争充当炮灰。很明显，帝

国主义者这样做，是他們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所需要的。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代言人把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反对侵略的斗争說成是由“种族仇恨”所驅使，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謊言。他們用这个謊言来掩盖帝国主义侵略的阶级本性，抹煞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种族歧视，归根到底，起源于阶级剝削制度，起源于帝国主义制度。不把阶级剝削制度消灭，不把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种族歧视是不能消灭的。这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只有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間、帝国主义的‘文明的’奴隶和‘不文明的’奴隶之間的那堵墙就被推倒了。这种情况大大地促进了把落后的殖民地的斗争和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斗争配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②

目前，在美国，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高漲，实质上是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反映。美国最近几年来，黑人斗争此起彼伏，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壟断资本的高度集中，經濟危机愈益頻繁，企业建設經常开工不足，失业現象特別严重，广大的被压迫阶级对壟断资产阶级的不滿与日俱增；美帝国主义为了緩和这种日益尖锐的矛盾，它一方面策动和纵容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以种族仇恨来轉移人民的視綫；另一方面又对黑人許下一些空口諾言，作出一些欺騙性的姿态，以达到在国内麻痹黑人的斗志，在国外便于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目

^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35頁。

^② 《論民族問題的提法》。《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3頁。



的。尽管美国统治阶级呼吁黑人“忍耐”，但是，黑人的斗争仍然日益继续高涨。事实的真相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①。

三

一个世纪以来，不论在欧洲、非洲，还是在美洲，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在美国历史上就有过二百多次黑奴反抗和起义事件。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黑人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在南非和美国都陆续出现了黑人自己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在领导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都曾经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特别是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在领导黑人运动中，始终坚持执行了积极斗争的路线，同各种妥协投降的倾向作了斗争。

美国种族主义者面对着汹涌澎湃的有色人种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采取了种种欺骗手法，如通过立法允诺黑人的某些自由权利，或者经济上施以小恩小惠等等。他们企图用这些办法来麻痹黑人的阶级意识，转移黑人的斗争目标，使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的“仁慈”上，把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的宪法范围内，使黑人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早就教导我们，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宪法只能体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绝不可能成为保卫黑人利益和解放黑人的武器。恰恰相反，剥削阶级正是通过宪法来推

行它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在南非，一切种族歧视和压迫，都是通过国家公开立法明目张胆地实行的。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虽然也有冠冕堂皇的“维护人权”的字眼，但这只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宪法虚伪性的时候，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宪法总是“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②，“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③。所以，企图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条件下，通过资产阶级的立法手段，来彻底消灭种族歧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斯大林在批判谢米奇企图引用列宁的话来说明民族问题是立宪问题而不是革命问题的时候指出：“这完全不对。列宁从来没有陷入而且也不可能陷入立宪的幻想。……列宁谈到过宪法，但他所指的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立宪道路，而是革命道路”^④。

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的信号。要彻底消灭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只有在消灭帝国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废除了剥削制度，也就在根本上消灭了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根源。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有解放全世界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义务，没有歧视和

- ①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见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第1版。
- ②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5页。
- ③ 《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88页。
- ④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9页。



压迫别的民族的权利。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政策，就是主张一切民族自由平等，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阶级斗争的现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种族、民族问题的理论，教育和鼓舞了全世界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黑人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地提高了，他们在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逐渐懂得依靠谈判协商是消除不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祸根的，仅仅依靠法庭斗争和游行示威也是消灭不了种族主义的罪行的。愈来愈多的黑人逐渐认识到，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剥削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并且采用了武装斗争的方式。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说：“要解脱压迫的绞索，靠乞求于压迫者的良心是做不到的。像种族压迫这种根本的问题，本身就需要用武力才能得到解决。”^① 南非人民为了反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起，已开始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美国，近几年来，随着美国黑人的觉醒，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也有了猛烈的发展。这些斗争是反对种族歧视、争取人权的斗争，同时，这个斗争是美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今天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个斗争发生在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的心脏，其意义更为重大，它获得了全世界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

被压迫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并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

切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 and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对于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都应该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做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利益，而对他们的斗争采取热烈的同情和积极支持的态度。列宁说：“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②

中国人民一贯以深切的同情，坚决支持美国黑人和非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把这种支持看成是自己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也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看做是对自己的支持。如果有人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

目前，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正在不断地走向新的高涨，一切遭受压迫的种族和民族最后将得到彻底解放。毛泽东同志指出：“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③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伟大预言，鼓舞着美国黑人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科学预言一定会实现。

① 见1963年8月13日《人民日报》第4版。

② 《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2页。

③ 见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第1版。



介绍一本揭露美国控制加拿大的书

思慕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它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成了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不仅竭力向所谓不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而且加紧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兼并和控制。毛泽东同志在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谈话中说：“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一九六三年，加拿大北方书店出版的《他们怎样把我们的加拿大卖给美国》一书，具体地描述了被美国踩在脚下的加拿大的情况。作者（笔名拉摩里）用大量的事实材料，从各个方面揭露了美国垄断资本怎样渗透和控制了加拿大，使这个富饶的北面邻邦在“地理上、经济上、政治上以至军事上沦为美国霸主的殖民地”。在书中，作者对美帝国主义这

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进行了抨击和提出控诉，并对加拿大统治集团屈从美国、出卖加拿大民族利益的行为表示了不满。

我们知道，加拿大曾经是欧洲移民的殖民地，但到后来也发展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至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五十个最大的金融资本家控制了全国大部分的资产），资本输出也有了相当的规模（它参加了“援印俱乐部”、“科伦坡计划”等）。它是北大西洋集团的成员国，参加过美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加拿大在名义上又算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自治领），实际上处于美国垄断资本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控制之下，变成了美国的附庸。

经济命脉掌握在华尔街手中

作者首先在历史的简单叙述中指出，美国垄断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便开始渗入加拿大，仅仅经过了十多年的光景，就逐步使自己在加拿大的经济势力凌驾于英国之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加拿大的价值五十亿加元（一加元合零点九七美元）的资产便落在美国人的手中。过了十年，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从一九五五年以后，美国在加拿大的资产每年约增加十亿加元。据一个加拿大经济学家的估计，一九五九年美国在加拿大全部资产达二百亿加元，所赚的利润占加拿大全部利润的一半。但本书作者认为，把今天美国在加拿大的全部资产估计为五百亿加元，恐怕还是保守了一点。



今天，加拿大国民经济命脉和所有最有利可图的投資場所，都完全为美国人所掌握。在关键性和新兴的工业部門，如石油、煤气、汽車、采矿、冶炼、机器制造、电机、化学等工业，美資公司所生产的份額，占加拿大这些部門全部产額的百分之六十至一百。另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对加拿大工业部門控制的比重是：采矿和冶炼业百分之五十三，石油和天然气百分之六十九，制造业百分之四十四，汽車工业百分之九十五，橡胶工业百分之七十七，电力工业百分之六十，化学工业百分之五十一，造纸工业百分之四十五。美国大工业企业在外国開設的数以千計的子公司，几乎有半数是在加拿大。美国的大壟断組織，如通用汽車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杜邦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等等，在加拿大都設有分支机构。显然，美国私人資本近年所以涌到加拿大去直接投資，設立工厂，不仅是为了直接占領加拿大的市場，而且是为了钻英帝国特惠制的空子，使美国公司在加拿大制造的商品輸出到其他英联邦国家时，可以享受关税上的特惠。

为了掩人耳目，好些美国公司都挂羊头卖狗肉，在招牌上添上“加拿大”的字样，如什么“加拿大杜邦公司”、“加拿大通用汽車公司”等等，但实际上它們都是百分之百的美国壟断企业。纵然有些美国大公司过去有点加拿大人的股份，近几年来这些“外国人”（指加拿大人）也一批一批地被“踢走”。过去原是加拿大商人開設的企业，只要有大錢

可賺，美国壟断資本便把它們收买过来。甚至像“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那样的大运输企业，今天加拿大人所占的股份也只剩下不到百分之十六了。

美国壟断資本迫使加拿大政府实行有利于它的賦稅政策，以便向加拿大大量輸出资本。作者列举了加拿大稅法中对于美国資本的十二項优惠待遇，如設在加拿大的美国公司向国内汇回利潤，事实上免征利潤稅，美国公司把所賺得的利潤在加拿大開設另一公司也免征利潤稅，在加拿大开采新矿山、新油田的美国公司，可以从攫取的利潤中扣回所有的开发費而不用納稅等等。这种賦稅政策实施的結果，阻止了加拿大人去开发或拥有美国人所需要的那些有价值的加拿大資源，而“美国人却由加拿大納稅人貼錢把加拿大的資源拿过来”。作者又說，加拿大資本家在美投資二十亿美元，每年要繳納利潤稅約一亿四千万美元。如果在加拿大投資逾二百亿美元的美国壟断組織也照样納稅，則渥太华政府每年就可收到十四亿美元以上的稅款，比現在从全国加拿大人開設的公司所征收的稅款还多。

不等价的貿易和对原料的掠夺

賤买貴卖的不等价貿易，是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不发达”国家进行掠夺的慣用手法。現在它也成为美帝国主义用来向加拿大这样的資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經濟擴張的工具。在美国的对外商品傾



銷中，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出口市場，美国对加拿大的片面的不平等的貿易，是掠夺加拿大的重要手段。例如，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美国从加拿大輸入二百亿加元，而向加拿大輸出二百七十亿加元。这样，七十亿加元便流入了美国。一九六一年美国人平均每人向加拿大购买价值十六美元的商品，而加拿大人平均每人向美国购买二百零七美元的商品，也就是十三倍于前者之数。正因为加拿大人向美国买的多，卖的少，特别是因为加拿大向美国买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并且按照美国的壟断高价买，而卖给美国的却主要是原料，并按照壟断低价卖，加拿大的资源和加拿大人民的膏血，便最大限度地被榨取去化成了华尔街亿万富翁的惊人的壟断利潤。作者举例說，加拿大卖给美国的铁矿砂每吨不到十块美元，而从美国买回的汽車、机器等制成品每吨却价值一千美元以上。由于这种不等价交換，由于原料和制成品价格的这种剪刀差，美国壟断資本家所賺得的壟断利潤往往高达百分之一千以上。

作者还特辟一章来談美国掠夺加拿大原料——特别是战略原料的情况。加拿大是美国所需原料的最大供应者。“沒有加拿大的鎳、铁、鉛、銅、鋅、石棉、紙浆、紙、鋁——更不要說那些不好讲出来的原料——的大量流入，美国的惊人的富足的經濟就永不能建立起来，現在一年也維持不下去。”以鈾來說，自从原子时代开始以来，加拿大輸往美国的氧化鈾，至少达八万吨，每吨售价

約二万美元，共达十多亿美元，加拿大氧化鈾的大量供应，使美国有可能大量制造和囤积核武器。作者指出，如果这些氧化鈾留在加拿大并用来发电，八万吨的氧化鈾就可以发出价值十亿美元的电力。因此，根据他的計算，每个加拿大家庭由于大量氧化鈾輸往美国而遭受的损失达二百万美元。

談到这里，我們得补充指出一点。正是由于美国壟断資本要使加拿大永远成为美国工业的原料供应基地，它在加拿大設立的許多工厂往往只是美国本国工业的輔助，甚至是装配厂的性质。也正由于这个緣故，加拿大的工业虽有了大規模的发展，却没有建成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好些工业品还是要从美国輸入，这就使加拿大在經濟上不能不从属于美国。

此外，作者向我們指出，美国壟断資本所以这样无孔不入地向加拿大渗透，并在加拿大开办这么多的厂矿，不单是因为这个邻邦拥有极其富饒的天然資源，而且因为它有着比美国低廉的劳动力可供剝削。尽管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資本主义发达国家，美国工人遭受着壟断資本的残酷剝削和压迫，但是加拿大工人的生活水平又比美国工人更低一些。二十年前，加拿大产业工人平均每周工資大約比美国工人少三美元，随着美国对加拿大經濟侵略的加剧，美国資本家成为加拿大工人的主要雇主之后，这个工資差距又增加了好几倍。这样，美国壟断資本在加拿大获得的利潤，就远高于在本国的壟断利潤。



魔爪伸到加拿大的銀行 和各級政府

作者还揭露，美国的金融資本不仅掌握了加拿大的資源和工业，而且控制了加拿大的銀行以至加拿大的政府。作者告訴我們，加拿大有不少叫做“基金”的新金融机构，而一些最大的“基金”却由美国人操纵。美国壟断組織假手这些新金融机构，购买加拿大的大企业、大銀行的股票，从而把它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些美国人開設的“基金”还向加拿大人招股，目的在于搜刮加拿大人的儲蓄，加速美国資本的积累，以供购买加拿大之用。这种做法同美国大公司在国内以“人民資本主义”作幌子所搞的“股份資本民主化”的騙人把戏，如出一轍。

本来，經濟上的依賴总不免导致政治上的从屬，現在美国壟断資本更以債权人的身份进一步控制加拿大政府。为了弥补近年国际收支的巨額赤字，加拿大不得不向美国借債。根据作者的估計，截至最近，加拿大各級政府欠債达三百四十亿加元，而这些債券的大半数都直接或間接地落在美国金融机构的手中。美国人购买加拿大政府債券所获得的利息比购买美国公債的利息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加拿大各級政府每年要支付的公債利息几达十亿加元，其中大部分是送到美国人的腰包里，而这笔利息当然最后是由加拿大的劳动人民負担。凭仗着債主老爷的地位，美国資本家已經能够向加拿大各級

政府发号施令，不容許它們頒布不利于美国人利益的法令和采取不利于美国人的財政措施。

作者还用一章的篇幅专談美国对加拿大的軍事控制。作者用事实說明，加拿大的“国防”，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国防”，說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加拿大人民为了“美国的国防計劃”而被迫付出了二百亿加元的軍費。

总之，今天的加拿大，从經濟到政治、到軍事，都处于美国的全面控制之下。

美国壟断資本給加拿大 带来經濟衰退

談到加拿大被出賣給美国的后果时，作者指出，美国壟断資本的控制，絕不是像有些加拿大經濟学家所說的那樣，給加拿大带来“經濟进步”，而是带来衰退和危机。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加拿大的生产（按人口平均計算）下降了百分之四。最近两年，企业破产的数目大大增加，比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任何一年都多。按人口平均計算，加拿大的对外貿易曾占世界第一位，現在則跌到第八位。根据官方估計，一九六二年冬天，加拿大的失业人数达到五十五万人，但实际数字已超过六十二万，失业率几达百分之十，比美国差不多高一倍。农民也大量破产，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〇年，农民离开土地的达十四万人之多。

可是，美国壟断集团对在加拿大已有的



榨取并不满足，为了转嫁自己的经济危机，以邻为壑，现在正从两方面对加拿大加紧挤压。一方面，美国要缩减从加拿大的进口，从而更扩大加拿大的对美贸易入超，另一方面要阻挠加拿大同其他国家做生意，特别是猛烈反对同中国和古巴的贸易。美国还要进一步独占加拿大市场，把英国和英联邦的进口货排挤掉。美国的计划是要加拿大加入美国的关税同盟，实行所谓“经济溶合”，好让美国货完全免税涌入加拿大市场。据作者估计，如果这个计划实现的话，加拿大的次要的工业也会马上破产，失业人数将会骤增一倍半，生产将会倒退二三十年。

目前，美加“合并”之说甚嚣尘上，可是，在作者看来，美国是不肯这样做的。因为合并之后，加拿大变成美国一州，与其他五十个州同等待遇，那么，“美国霸占加拿大的殖民地利润结构马上就要坍台”，“美国金融资本单在贸易方面每月从加拿大榨取的近一亿加元的超额利润就会丧失掉。”因此，打打算盘，美国垄断集团还是愿意让加拿大继续停留在半殖民地的状态，而不把它合并过来。

反美情绪在发展

但是，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哪里有侵略，那里就有反侵略的斗争。加拿大也不例外。何况，美国垄断资本不仅压迫加拿大的劳动人民、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挤压、控制加拿大许多大企业家，因而，美加两国

垄断资本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作者告诉我们，在美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经济侵略和奴役之下，加拿大跟美国闹独立性的离心倾向，日益表面化了。这个事实，美国佬也不能不看到。一九四八年，美国《生活》杂志还可以有信心地说，“加拿大人是我们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可是，到了一九六〇年，《美国新闻》报道说，“今天加拿大的最流行的政治话题或许就是‘反美主义’。”一九六一年，《时代》周刊也说：“民族主义和摆脱美国领导的潮流正在加拿大澎湃起来。”

以加拿大企业家反对美国垄断资本渗透和控制的斗争而论，近几年来的确有了明显的发展。美国农产品竞争性的倾销和华盛顿干涉加拿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贸易，曾经激起了加拿大资产阶级强烈的反应。五十年代中期，在前加拿大国家银行行长柯恩的倡导之下，加拿大曾展开了限制美资流入和控制关键性企业的运动。一九六〇年，加拿大政府曾一度通过一项法案来限制美国人开采加拿大北极地区丰富的油田。一九六三年六月，加拿大政府在向议会提出财政预算时，又曾提出两项限制外资（主要是美资）的税收措施。加拿大不顾华盛顿政府的反对，继续同中国和古巴贸易，也加深了美加的经济矛盾。

诚然，美帝国主义对加拿大的箝制还是相当厉害，加拿大统治集团还不能不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前加拿大国家银行行长柯恩因为提出维护民族经济，反对美国经济兼并的主张而被迫辞职，就是一个例子。迪芬贝克



政府因为不同意加拿大的火箭和飞机装上美国核弹头而被迫下台，又是一个例子。这说明，加拿大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将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但是，如作者所指出的，加拿大人民有过抗美传统，加拿大人民不会长期忍受美国的控制、干涉和欺负的。今天古巴人

民反美斗争胜利的光辉范例又加强了加拿大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心。随着美国对加拿大控制的加深，以及在世界人民的打击下，在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中，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地位的日渐削弱，加拿大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将会日益发展。

两种姿态，一副肖像

郭方

六月三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了长篇演说，大肆吹嘘现在美国实力之强大，简直无可比拟。

无巧不成书。在约翰逊讲话前不久，美国资产阶级评论员李普曼也发表过一篇谈话，同总统的调子相反，他慨叹现在美国在世界上的处境糟糕透顶。

比较一下美国当今这两个“著名”人物的言论，的确是很有意思的。

约翰逊说：“我们美国人不仅对我们自己的安全负有责任，而且对一切自由国家的安全负有责任，不仅对我们自己的社会负有责任，而且对整个文明负有责任，不仅对我们自己的自由负有责任，而且对全人类的自由负有责任。”

李普曼说：“美国的战后地位实际已经恶化了”，“我们有过这种幻想，世界的一切都应按我们的意图行事，美国现在得出一条一

般合乎人情的经验，即并不是一切都如我们所愿的那样进行”，“由美国领导的想法是愚蠢的”。

约翰逊说：“今天美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强。它比任何对手或者所有对手合在一起都要强。它比世界上有史以来所有国家的力量合在一起都要强。”

李普曼说：“美国的力量和世界上其他力量比较是缩小了。”

约翰逊说：我们“所抱的希望”，“取决于我们武器的力量”，美国现在的什么“核力量”，什么小规模“战争的能力”，“作战人员的能力”等等，都在“日益增长”。

李普曼说：“军事力量并不是一切”，“我们在南越从未占过优势”，美国的原子武器“在南越和桑给巴尔一无用处”。

以世界宪兵自居的这个美国总统，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样子，完全是在虚张声势，借



以吓人。据合众国际社叫嚷：“约翰逊显然是警告中国共产党人和亚洲其他共产党人的颠覆目的说，为了对付颠覆活动的美国特种部队从一九六一年一月以来增加了七倍”。把这段话翻译成普通人能听得懂的话，应当是，美帝国主义为了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制造了所谓共产党人进行颠覆活动的谣言，并且大大地发展了所谓“特种部队”，进行着罪恶的侵略的“特种战争”。“增加了七倍”的美国“特种部队”，到底有多么厉害，毋庸那么去认真对待，世界人民关心的有力事实倒是：在美帝国主义进行“特种战争”试验场的南越，三年多来，人民自卫武装力量歼灭敌人的数字，已经高升到了十八万多人，而其中美国军事人员就有一千多人。

约翰逊的虚声恫吓，不能不使人联想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争中的一段故事。据说，当时有一个叫马霞尔的美国准将，曾经十分得意地发现，动员士兵在战场上大喊大叫，对于鼓舞士兵向敌人开火是很有用处的。这个准将申述他的理由说：“大喊大叫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人一喊叫就会明白自己是一堆人中间的一个，而不再是可怜的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它能够激起连锁反应，这种反应是能在战场上把绵羊变成狮子的。”看来，约翰逊并不比马霞尔高明许多。同美国军队在战场上大喊大叫一样，约翰逊企图唬人的炫耀美国实力地位的叫嚷，除了充分暴露出美国帝国主义既好战又虚弱的本性以外，到底有多大价值，是不难得出结论来的。

至于那位评论员李普曼呢，他不得不承

认，当前民族解放运动声势浩大，是使美国统治集团最为头痛的一件大事，他疾呼要美国统治集团正视现实，寻找一条出路。“我们面临……落后民族的革命，这次革命将延续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无法制止这种革命”，“我们大家必须齐心协力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生活，开导革命并使它文明化”。鼓吹用更为狡猾的办法来遏止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不过是肯尼迪之流的故技，但这位评论员这一次总还算比较老实，承认“我们无法制止这种革命”，没有去胡吹什么美国今天比它的“任何对手或者所有对手合在一起都要强”之类的蠢话。

顺便说一句，在美国，资产阶级报刊持有同李普曼一样看法的，并不是一家两家。例如，六月六、七日合刊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对他们总统的讲话就给了这样的评价：尽管约翰逊开列了一张吹嘘美国武装力量的“给人印象很深”的“清单”，但“它仍然解决不了我们当前的问题”。这家报纸也明确地供认，美国政府的“军事决算表”上一桩“令人不愉快的事实”是，美国统治集团的核讹诈政策，不能吓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

一个哀鸣，一个恫吓，看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然而，它们却共同反映出了美国帝国主义日落西山的命运和力不从心的窘态。哀鸣——处境不妙，恫吓——黔驴技穷。人们把这两篇讲话对照来看，不正是看到了一副活生生的外强中干的美国纸老虎的肖像了么？



一件小事变成大好事

· 楊 春 旭 ·

前些时候，在西安市的一个商店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驻西安的人民解放军某部的一位同志，在商店买了两个暖水瓶。第二天，这位解放军同志拿来一个暖水瓶要换，恰巧那位经手的营业员到别的柜台去帮助工作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营业员不熟悉情况，要他“等一等”。这时，旁边又来了一位顾客要买铁丝，营业员迎上去一看，铁丝上面没有贴上价格标签，不知道该怎么卖，又告诉买铁丝的顾客“等一等”。换暖水瓶的解放军同志等得不耐烦了，连问“你是不是营业员？”营业员回答：“我不是营业员，我站在这儿干啥！”这样，你来我往，双方顶撞了几句。

当时，柜台外面有解放军的两位军官和两位战士，批评了换暖水瓶的解放军同志，并劝他回部队。这位解放军同志回去以后主动地做了检讨。部队领导机关两小时内就派人到现场调查。当天晚上，部队领导同志作了研究，第二天，带着那位同志一起到商店道歉。在短短的几天内，部队召开了干部大会，表扬了热爱集体荣誉、积极维护军纪的同志，批评了有缺点的同志。这样，就使广大官兵受到了深刻教育，进一步认识到关心营业员、尊重营业员、帮助营业员是阶级友

爱的具体表现。这样，也鼓舞了商业职工为顾客服务的积极性。

在事情发生的第三天，商店召开了党的总支会议，检查了商店工作中的缺点，商店的领导人到部队驻地道了歉。随后，上级商业领导部门召开了党的会议和职工会议，号召全体职工进一步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作风，认识自己工作中的各种缺点，进一步加强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由于双方都能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这件小事就变成了大好事。

这件事，是发人深省的。

首先，人民解放军驻西安某部的作风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把这件小事，当作了尊重群众利益、密切军民关系的大事。领导部门在发现和处理这件事上，严格地贯彻了革命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了“三八作风”，发扬了拥政爱民的精神。他们这种通过自我批评、加强人民内部团结的精神，严明的、自觉的、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善于抓活事、活思想、严格防微杜渐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对于一切部门，都可以作为



榜樣。把這些東西統統學到手，就可以把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

其次，西安的這個商店也值得學習。他們對待自己工作中的缺點，採取了認真嚴肅的態度。抓住這件事，採取了一系列改進工作的措施。包括加強基本功的鍛煉，熟悉商品，精通業務，決心克服“一問三不知”的缺點；加強基礎工作，貫徹政策，改進制度，堅持崗位責任制，對每一種商品都貼上了標籤，合理組織勞動力，千方百計地為顧客提供方便；加強基層政治工作，抓人的思想革命化，教育營業員更自覺地為人民服務。

更重要的是，通過營業員和顧客的這種關係，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群眾這一部分同那一部分的關係是一種完全新型的關係。我們不僅要在營業員和顧客之間鞏固和發展這種關係，而且要在一切人們中間鞏固和發展這種關係。

社會主義商業是農業和工業、生產和消費之間的橋樑，營業員是社會主義建設戰線上的光榮戰士，是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者每天都離不開的同志和戰友。營業員和廣大顧客之間的關係是社會主義互助合作的關係，他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營業員和顧客儘管職業不同，工作崗位不同，但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點，都搞的是革命工作。營業員全心全意地為顧客服務，顧客尊重和支持營業員，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新風尚。

當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營業員和顧客之間還是存在着矛盾的。這種矛盾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工業和農業、生產和消

費之間的矛盾在市場上的反映。營業員可以反映情況，提出意見，也可以向顧客作一些宣傳解釋，但是，這一矛盾是營業員本身所不能解決的，它要通過發展生產，通過國家計劃的安排和調整來解決。另一方面，是營業員和顧客雙方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在買賣手續、購銷方法等方面的要求不一樣。這一矛盾只要營業員提高服務質量，練好基本功，改進工作方法和服務態度，顧客體諒營業員的困難，積極幫助他們工作，是可以解決的。

營業員為顧客服務，就是為人民服務。政治覺悟高、業務熟練和基本功好的營業員，是能夠和顧客搞好關係，正確處理他們和顧客之間的矛盾的，即使有時發生了某些不愉快的事，也能夠立即採取正確態度和妥當辦法，適當地解決這種矛盾。

例如，沈陽市食品雜貨公司營業員李素文同志遇見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位老大娘向她買卷煙，給了五元錢，她給老大娘找回一元四角，當場錢貨兩清。不料，快下班的時候，這位老大娘氣沖沖地趕來說：“你這個人，心不好，為什麼沒有給我找錢，硬說找給我了呢？”這時，李素文同志很委屈，想跟老大娘分辯分辯。可是她覺得“為人民服務，受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再說，真的爭辯起來也不會產生好結果”。想到這裡，她氣消了，很和氣地對老大娘說：“你老人家別着急，回家去再想想，要是真的沒有把錢找給你，我就再找給你。”這樣就避免了吵嘴。第三天，這位老大娘到商店來拍手打掌地說：“姑娘呀，我給你道歉來啦，錢沒有錯在你



这儿，那天我向你耍，这该多委屈你呀！可真太不对啦！以后若是从我门口路过的时候，千万到我家去串门子呀。”李素文同志说得对：“要是不想到毛主席的教导，真跟老大娘吵上架，把她气个够呛，她就是把钱找到了，也不会送信来呀。”

例如，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营业员徐炳富同志，有一次接到顾客的一封信。信中说，她买头巾时，因有急事，当时没有仔细挑选，买回去一细看，发现头巾上有毛病，很不满意。徐炳富同志看到信以后，感到这是一个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第二天，他乘休息日就去江湾访问那位顾客，由于信上地址不清，找来找去找不到，他就请邮局同志帮助，找到了发信人的家。但由于她们夫妇两人都上班了，扑了空。接着他又到顾客的工作单位把他们找到了，给她换了一条满意的头巾。那位顾客感动得说：“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会有对人民负责到底的营业员”。徐炳富同志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为顾客服务，纠正自己工作中的疏忽缺点，避免了不良的影响。他说：“宁愿自己麻烦千遍，不让顾客感到不便。顾客的满意，是营业员最大的愉快”。

在全国像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营业员是举不胜举的。这些营业员的共同特点，都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的有关指示当作“金钥匙”、“智慧的源泉”、“工作的动力”。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平凡的工作中，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

在旧社会里，地主、资本家是看不起营业员的工作的，一切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人，也看不起营业员工作，他们都把营业员的工作，看作是低人一等的事情。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岗位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营业员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的劳动和一切劳动一样，是光荣的。我国商业战线上营业员的劳动和热情，受到了广大顾客的尊重和支持。工人和城市居民称营业员为“群众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农民称营业员为农业生产的“参谋”和“后勤兵”，农民生活的“管家人”；少数民族人民称营业员为“毛主席派来的人”，“是给我们送幸福的人”。那种认为商业服务业低人一等的剥削阶级观点，已经越来越为广大人民所唾弃。

营业员和顾客之间的新型关系，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会有这种全心全意、忘我劳动、满腔热情为顾客服务的营业员。

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有这样以平等态度，尊重营业员的劳动，体贴营业员的困难，鼓励营业员辛勤劳动的顾客。

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这种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促进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种风格是高尚的。我们不仅应该在营业员和顾客之间提倡和发扬这种风格，而且在一切部门和一切工作中，都应该大大提倡这种风格，大大发扬这种风格。



原則和規章制度

· 蔡 金 ·

有时听到某些同志有这样一种说法：“领导嘛，只要掌握原则就行了”。

这话又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掌握原则确实是领导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没有正确的原则为指导，什么事也办不好的。说它不对，是因为单这样说，就把掌握原则片面理解了。所谓掌握原则，就是在解决具体问题和具体制度上掌握原则，完全不管具体问题的解决和具体制度的执行，那么，掌握原则也就变成空话了。

比如，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是现阶段人民公社必须掌握的一条原则。怎样掌握这条原则呢？归根到底，还是要研究和确定有关劳动报酬的各种具体制度，生产队之间劳动力协作当中的换工制度，商品交换中的价格制度等。

比如，既保证需要，又节约使用，这是流动资金管理上必须掌握的一条原则。怎样掌握这条原则呢？归根到底，还是要研究和确定流动资金供应制度，管理制度，以及处理产品积压，协调供产销关系等问题。

比如，先维修、后新建，先生产、后基建，这是处理维修、生产、基建相互关系必须掌握的一条原则。怎样掌握这条原则呢？

归根到底，还要研究和确定计划安排、物资分配次序、资金分配次序等具体制度。

总之，离开了具体制度，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等原则，就无法掌握，难于贯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一切原则，都要通过具体问题才能体现出来。如果只空谈原则，只空喊掌握原则，而不亲自了解具体情况，不具体地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不把正确的原则用规章制度固定下来，即使是最好的原则，也不能在实际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经常注意具体问题和具体制度的解决，是否会成为事务主义者呢？事实恰好相反。把原则和制度结合起来，深入实际，抓住普遍性的、带关键性的问题，同群众一起，透彻地加以解决，就会把千头万绪的复杂事物理出个纲来，做到纲举目张。这不但不会使自己陷入琐碎事务，反而会从事务主义圈子中解放出来。否则，你越是空喊原则，而不深入实际解决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越要找你，越要缠住你不放。

我们办工业企业，既要集中统一的领导，又要走群众路线，这是极为重要的原则。但有些企业尽管经常讲这些原则，由于规章制



度不健全，由于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这些原则，迫切需要严格管起来的事情，没有专人管理，职工积极性很高，想把事情管好，但又不知怎样管好。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同志，只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就到哪里去补漏洞，忙于应付，结果是事倍功半。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有些企业的领导同志针对这种情况，便深入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他们从消灭无人负责的现象做起，把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日常生活中千万个具体事情联结起来，建立了一套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简便易行、紧密衔接的规章制度，包括：岗位责任制，巡回检查制，交接班制，设备维护保养制，质量检查负责制，班组经济核算制，等等。这样做了以后，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人管，保持了严密而协调的生产秩序。群众说：“以往好像两只手抓鸡蛋，一次只抓几个，现在有了岗位责任制，就像把好多鸡蛋装进一个篮子里，一次就可以提走”。可见，有了原则，再根据原则订出规章制度来，就可以把千万个具体问题交给广大群众自己解决了。这样做，正是使领导人员摆脱事务主义，而决不是陷入

事务主义的圈子。

有人说，只要做好人的工作就行了，规章制度是次要的。这也不全面。做好人的工作，无疑是要放在第一位的，但这决不是否定规章制度。做好人的工作，就包括教育职工认真执行规章制度。只有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才能把广大职工的干劲和积极性组织起来，用到刀刃上，用到国家迫切需要的生产建设上，才能使思想工作收到更大的效果。

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这里讲的是任务和 methods 的关系，如果用之于确定原则和制定规章制度的关系上来，我认为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做工作，光确定原则不行，还需要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规章制度来，动员组织群众来执行这些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原则的实现。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4页。

更 正

本刊今年第10期第27页第5—6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应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37页左栏倒数第18行“在十九世纪……”应为“在二十世纪……”，特此更正。



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从一个化工厂三种试验田的故事谈起

陆魁宏

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它不仅存在于各种科学领域，也存在于各项实际工作中，它与我们的实际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一项生产经验的形成、推广过程中，从一项政策、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通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一次比一次精确和丰富，一次比一次更符合于客观现实。原来经过实践证实的真理，经过新的实践的继续检验，越来越得到证实；原来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或理论的某些方面，则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证实它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

这里有辽宁省魏子窝化工厂领导干部三次深入盐场种试验田的故事。他们通过三种试验田，对于同海盐增产有重要关系的卤水深浅问题前后作出过三次规定。这个故事我认为对于理解实践标准的问题有启发，我们就从这个故事谈起吧。

这个厂各盐场的盐池卤水深度，在一九五八年的晒盐旺季里，一般为一厘米半到二

厘米。当时，东老滩盐场第八组的盐工们推行了“深卤结晶”的办法，把卤水加深，提高了盐产量。但是，很多工人对深卤结晶却不同意，有的人说：“大海水深，从来不结晶，圈里（貯海水庫）水深，也从来不长盐。深卤结晶不中用。”

盐池里的卤水究竟是深些好，还是浅些好？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一般性的回答，当然比较容易。但是，盐池卤水具体应该深到多少厘米，浅到多少厘米才合适，当初，这个厂的领导干部还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种试验田，让实践的结果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在这年的晒盐旺季，他们在东老滩盐场划出三十个池子作试验。其中，卤深二厘米、四厘米、六厘米，各灌十个池子。该厂的生产技术试验滩的技术员，也同时作试验。这时候，每天天气晴朗，烈日当空，卤水蒸发得快。不到一个月，试验田就扒了三次盐。计量结果，卤深四厘米和六厘米的池子比卤深二厘米的池子产盐多。生产技术试验滩也提出一份报告：卤深六厘米的池子比浅卤池多产盐百分之十四点五。根据这次试验，工厂规定，各盐池卤水深度一律由二厘米左右



加深到三至五厘米，实行深卤结晶。

第一次种试验田的实践结果，证明了实行深卤结晶能使海盐增产，这就经过实践初步证明了“深卤结晶好”这个认识的真理。

然而，“实行深卤结晶好”这种认识的真理程度究竟如何？求之于主观认识固然不能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光是第一次种试验田的实践也不能完满地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出这种认识的真理程度和确定这种认识的真理界限，就必须继续实践，让新的实践去继续检验。一九五九年三月春晒开始，工厂召开了现场会议，大张旗鼓地推行深卤结晶。可是，推行的结果，三月份五个盐场都没有完成计划，四月份也产盐不多。许多盐工组长纷纷议论：咱们三月“剃光头”，四月也低产，就是吃了深卤的亏。

推行深卤结晶的经验，没有达到增产海盐预想的目的，主观精神没有转化为客观物质，这就表明深卤结晶的经验是有条件的。这样，就促使人们去思考问题：深卤结晶办法为什么能在第一次种试验田的时候带来增产海盐的效果，而在今天推行当中却使海盐减产呢？

这个厂的领导干部经过研究，弄清了推行深卤结晶失败的原因。原来，在辽宁，三月份还没有到晒盐旺季，加以这一年三月春雨连绵，四月份也时阴时雨，卤水深了，结晶反而慢，盐产量不高。于是，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在一九六一年初春又开始第二次种试验田。他们划出二十个池子，一半灌四、五

厘米深的卤水，另一半灌二厘米半深的卤水。半个月后开始扒盐，浅卤池却比深卤池多产盐百分之二十五。这一次试验以后，工厂把原来的规定修改为：旺季深卤结晶，淡季卤水适当减浅。

由“深卤结晶”的初步规定到“旺季深卤结晶，淡季卤水适当减浅”的修正规定，是认识在继续实践中的深化过程。由于实践的继续检验，因而使人们开始明白深卤结晶能增产海盐的特定条件，懂得把“深卤结晶”置于“旺季”的条件之下，而且以“淡季卤水适当减浅”作为补充。把“深卤结晶”置于“旺季”的条件之下，从认识论讲，这就是给深卤结晶经验划定适用范围，确定它的真理界限。这就使认识向符合本厂的海盐生产规律的目标前进了一步。但这个厂的领导人并没有把这种修正规定贴上永恒真理的标签，而是让它在继续推行的实践过程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修订后的措施在一九六三年三月晒盐淡季推行，得到了良好的效果。可是到同年四、五月晒盐旺季，天气反常，时而大雨，时而阴云密布，各盐场实行深卤结晶，又变成减产了。在反复实践过程中，修正规定又暴露出了一些毛病，促使人们又提出了疑问：“旺季深卤结晶”这种认识的真理，恐怕还不十分完全吧？

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决定第三次种试验田。一天中午，厂长来到盐田，看到第四组的盐池卤水比邻组深，但池底长盐却没有邻组的厚。他找邻组组长李文家询问，李文家



二

望了望天色，說：“看天行事唄！像这样半阴不晴天，卤深吃亏，卤浅结晶快。”别的老盐工也介绍了自己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天晴卤深些好，天阴卤浅些好，应该根据天时，灵活掌握。

按照这些意见，厂长又作了一次试验，把卤水适当减浅。几天以后扒盐，每个池子比卤深时多产了半吨盐。于是他同大家一道，依据新的实践，又把深卤结晶的经验修改为：“以深为主，深浅结合，随天应变。”

上面这个经过再次修改充实的经验，同“深卤结晶”或者“旺季深卤结晶，淡季卤水适当减浅”的经验比较起来，显然完整得多，克服了前二者的片面性。全厂各盐场根据天时灵活掌握盐池卤水深浅，不论旺季淡季晴天雨天，都能增产，这标志着对于海盐生产规律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它更符合于本厂的海盐生产规律。

由“深卤结晶”的初步规定，到“旺季深卤结晶，淡季卤水适当减浅”的修正规定，再到“以深为主，深浅结合，随天应变”这个再次修改的规定，这中间经历了一个反复实践、反复检验认识的过程。第一次试验的结果，证明深卤结晶好；第二次试验的结果，证明只在旺季才深卤结晶好；第三次试验的结果，证明即使在旺季搞深卤结晶也未必都好，而必须分别晴天雨天，根据天时灵活掌握盐池卤水深浅。这样，深卤结晶的经验通过不断实践和不断检验的过程，越来越接近于真理，它的真理性界限越来越精确，它的真理性程度越来越完善。

何祚麻同志在《再谈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践标准问题》一文中，虽然没有像有些同志那样直截了当地认为真理可被推翻，然而他却主张在实践不断检验真理的过程中，对那些“不全面、不完善的相对真理”必须“不断修改”。如果何祚麻同志所说的“修改”是指补充、完善的意思，那就只是用词不当的问题，但是，仔细体会他的意思之后，可以有根据地认为，他所说的“修改”，乃是“否定”、“推翻”的同义词。例如，他在分别表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特征时指出，绝对真理“不会被后来的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而相对真理则“要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改”^①。两句话是对称的，一个“不会被否定”，一个“要修改”，这意思很明显，就是一个“不会被否定”，一个“会被否定”（至少是部分地被否定）。

抱着真理需要修改的观点去看待上述深卤结晶经验不断修改的事实，也许何祚麻同志会认为，这恰好为他的观点找到了一个论据吧。然而，这个事实恰恰证明了真理不能被修改，不能被否定，不能被推翻。这个事实恰恰证明“真理需要修改”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就拿上面所举的那个事例来说吧。第一次种试验田的实践证明深卤结晶好，但这实际上并未证明在一切条件下都是深卤结晶

^① 《红旗》1964年第10期，第56页。



好,这从第二次試驗中就可以看出,它实际上只是证明了在旺季才实行深卤結晶好;第二次种試驗田的实践证明,“深卤結晶”的經驗并未在淡季的条件下被实践檢证为真理。第三次种試驗田的实践进一步证明,“深卤結晶”的經驗实际上并未在旺季的阴雨天被实践檢证为真理,它的真理性实际上只是在“每天天气晴朗,烈日当空,卤水蒸发得快”的旺季的实践中得到过证明。因此,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原有真理被推翻的問題,也根本不存在真理本身需要“修改”的問題。恰恰相反,从这三次种試驗田的实践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再修改技术規定的事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种認識,只要是真正被实践檢证为符合客观实在的,它就具有客观真理的意义,它就是颠扑不破、推翻不了的。实践檢驗真理的过程,是越来越精确地划定真理性界限,以及整个認識越来越深化、越来越趋于完善的过程。

何祚麻同志会問:“深卤結晶好”这个認識不是受到过一再的修改嗎?而这种認識当初不是被人們认为是相对真理嗎?因此它的被修改岂不就是相对真理的被修改嗎?

我回答說:初次种試驗田的实践确实对“深卤結晶好”这种認識的真理性作过一定的檢驗,“深卤結晶好”这种經驗也确实受到过一再的修改,然而,我們看看,在“深卤結晶好”这种認識中,被修改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被修改了的东西并不是这种認識的經由实践檢证过的客观真理性。在“每天天气晴朗,烈日当空,卤水蒸发得快”的旺季的

实践中(或根据将来新的实践所发现的新条件的实践中)得到证明的“深卤結晶好”这种認識的真理性,是不能修改的,被修改的只是人們对“深卤結晶好”这种認識的适用范围的規定。当初人們籠統地认为深卤結晶好,因为彼时彼地他們还没有認識到“深卤結晶好”的特定条件,以致在淡季和在旺季的阴雨天实行深卤結晶时遭受了失敗。他們从成功和失敗的經驗中,逐步明确了“深卤結晶好”的特定条件,从而逐步修改了他們对“深卤結晶好”这种認識的适用范围的規定。

在这里,我們必須明明白白地划清一条綫:一个是不能修改和不应修改的真理的客观內容;一个是可能修改和應該修改的真理的适用界限。二者不可混淆。真理可修改論者的失足之处,正是把不可修改的真理的客观內容当作可以修改的真理的适用界限。

同时,我們还有必要划清另一条綫:一个是被实践确证的真理;一个是被人們认为的真理。二者也不可混淆。馬克思說:“哲学是問:什么是真理?而不是問:什么被看做真理?”^①有些过去的确被人們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后来实践的确把这种認識推翻了。然而我們必須認識清楚,这种認識被推翻,并不是真理被推翻,因为这种認識本来就不是真理,它本来沒有被实践檢证为符合于客观实际,而不过是人們曾經把它誤认作真理罢了。

恩格斯在談到人們認識运动形态轉化的

^① 《第179号〈科倫日报〉社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6頁。



規律時說：“凭借新发现，我們可以給它（指規律）提供新证据，提供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如此表现的規律本身，我們是不能再增加什么的。”^① 列宁曾經举馬克思的貨幣流通理論为例指出，真理同对象之間的符合“是不能被将来任何情况所改变的，其原因很简单，正如拿破侖死于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是个永恒的真理一样。”^②

我們必須牢記这个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則。真理是不可推翻的，不可由人們随意去“修改”的。新的實踐只能使認識愈來愈接近于真理，使認識的真理性和豐富性，使真理性的界限愈來愈精確。在生产、工作、学习、研究中，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切行动中，我們必須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錯誤”，决不應該坚持錯誤，放棄真理。

三

认为在實踐檢驗真理的过程中真理可被推翻或可以修改，这实际上就是抹煞了實踐标准的絕對性。而认为某一科学原理已是絕對真理，它的真理性已达到完善得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实际上又是忘記了實踐标准的相对性。無論前者或后者，都是割裂了實踐标准的絕對性和相对性的对立統一关系。

在这里，我們有必要重溫列宁对这个問題的提法。列宁說：“實踐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駁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識变成‘絕對’，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的一切变种进行

无情的斗争。”^③ 列宁“同时”看到實踐标准的两种不同屬性，把實踐标准的絕對性和相对性辯证地統一起来，这就是在認識論中把唯物論和辯证法統一了起来，这样就有力地打击了在对待真理标准問題上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唯心主义、不可知主义观点。

所謂實踐标准“不确定”，这是說的實踐标准的相对性，这是由實踐的发展性和具体性所决定的。實踐是不断发展着的，当它处于一定的具体历史阶段上，它不可能完全证实或推翻現存的一切理論观点；在任何知識領域中，都会存在着一些未經证实或未被推翻的假說。實踐是人們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它是通过各个方面人們的具体的實踐活动体现出来的，一种理論是正确或是錯誤，只能求证于社會實踐的总和；如果光凭个别孤立的偶尔行动，那是不足以确证理論的。

所謂實踐标准是“确定”的，这是說的實踐标准的絕對性。實踐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它能带来现实的成效。它还有“普遍性的优点”，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对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所进行的實踐能够檢驗一般性的理論知識。真理是主体对客体的正确反映。真理的标准既不能求之于主观認識，也不能求之于客观事物本身，而只能求之于作为联结主体和客体的桥梁的社會實踐。實踐是唯一的、可能的和现实的真理标准，沒有、而且

^①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7頁。

^{②③} 《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3、142頁。重点系引者所加。



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标准来验证人类各种认识和理論的真假。这是绝对的、确定不移的。一种理論一旦真正被社会实践证实它是正确的，它就具有客观真理的意义，以后的实践之任何发展，都不能否定它所固有的客观真理性；一种理論，即使一时的实践不能验证它是否具有真理性，但实践的发展是无限的，任何一种一时不能得到檢驗的理論，在将来也只能靠实践去檢驗它，而且将来的实践一定能够檢驗它是否具有真理性。这也是绝对的、确定不移的。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能互相混淆，也不能彼此割裂，它們是辯证的統一。

还是拿魏子窩化工厂领导干部三次种試驗田这个事例来说吧。

从这三次种試驗田的实践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再修改技术规定的事实中，我們可以看出，实践标准是绝对的，在特定的条件下（比如在旺季的晴天里）“深卤結晶”硬是能使海盐增产，新的实践材料总是繼續证明这个认识是正确的，而不能推翻或修改它所固有的客观真理性。正因为这样，所以魏子窩化工厂关于盐池卤水深淺的三次规定中，都把“深卤結晶”考虑了进去。与此同时，我們又看出了由实践的发展性所决定的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一項正确的认识，只有通过实践的反复檢驗，其真理性才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你看，只是通过第一次种試驗田的实践，人們还认识不到“深卤結晶”应置于“旺季”的条件之下，即使通过第二次种

試驗田的实践，人們也还认识不到“深卤結晶”应置于“晴天的旺季”的特定条件之下，因为“深卤結晶”經驗的真理性那时还未充分地显示出来；只有人們經過成功和失敗的多次試驗，从正面和反面檢驗之后，才比較清楚地認識到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在实践发展过程中，一种理論的真理性界限将得到越来越精确的划定，正因为这样，所以該厂每总结出一經驗之后，总不把它看成是穷尽了一切的終极真理，即使已經找到了“以深为主，深淺結合，随天应变”这样一个比較完整的經驗，也沒有到此止步，而是让新的实践去繼續檢驗這項經驗的真理性界限和真理性完善程度。

实践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这种情况，从一个生产队的生产实践对一項农业生产计划的檢驗过程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比如說，一个生产队，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对生产指标、作物品种、播种面积、密植規格、施肥数量、劳力安排等等，作出了计划，由于这个计划的付諸执行，結果获得了丰收。丰收的事实证明这个计划是訂得正确的，切实可行的。从認識論讲，这就是生产实践檢驗了这一农业生产计划所具有的真理性。这是真理的绝对性的具体表現，也是实践标准的绝对性的具体表現。但是，我們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个计划所具有的真理性相对性和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就是說，虽然这个计划符合本队的实际情况，但它只是近似的符合，它不可能完全地反映本队的一切情况，特别是随着季节的更替，各



种生产条件的变化，人們新的需求的提出，前所未料的情况的出现，新的实践会表明原计划的局限性，证明这个计划还需要补充、修改，或者另外制订新的生产计划。

我们必须如实地全面看到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而不能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忽略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不看到一个经由实践验证的计划、方针、政策的相对真理性和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就会把自己的思想封闭起来，固步自封，不能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同样，如果我们不看到一个经由实践验证的计划、方针、政策的绝对真理性和实践标准的绝对性，那就会对任何计划、方针、政策都失去信心，认为任何计划、方针、政策都没有制订的必要，这样下去，就会使工作无所遵循，只能消极盲目地任凭自然界去摆布，而不能积极自觉地进行改造世界的斗争。

在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就是：一种正确的或是比较正确的理论，由于在执行方面发生某种偏差，因而一时一地的实践行动没有证明它的真理性，但是以后的实践纠正了执行方面的错误，终于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真理性。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就可能遇到这种情形。例如，一项正确的政策，如果执行得不好，在一个时候的具体执行中存在着缺点和错误，那么，彼时彼地的执行就不能证实这一正确政策的真理性；但是一旦纠正了执行中的错误，保证它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这时，这一正确政策就可以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从

而閃发出真理的光辉。

上述同样表明，实践标准是相对的，同时又是绝对的。一项政策本来是正确的，但因执行错误而证实不了它的真理性。这就是说，个别孤立的偶尔的事实和行动，不足以确切证明理论、政策是正确还是错误。这也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的一种表现。但是，纠正了具体执行中的缺点和错误，一项正确的政策就一定可以化为物质力量，这就是说，社会实践的总和、全体以及各个具体实践活动的联系，是能够确切证明一项认识的真理性的。由此，我们又看出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我们了解到实践标准的绝对性的这种表现，懂得了社会实践的总和、全体以及各个具体实践活动的联系是能够确证一项认识是具有真理性的，这样，我们就不至于把社会实践的个别现象，当作判断某一理论的依据，而会自觉地去以“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尺度”^①。

总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确证并发展真理和不断揭露并克服错误的过程，是一个越来越精确地划定真理性界限和使真理性趋于完善的过程；而决不是“修改”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是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由浅知到深知的过程，实践标准是相对的，同时又是绝对的，是二者的辩证统一。

以上意见未必正确，提出来请大家指正。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6页。

